

春秋“吴都”“三都并峙”现状与苏州古城历史文化地位的叙述

——近三十年来有关苏州古城历史的争议述论

兼及纪念苏州古城建城二千五百三十周年

吴恩培

(苏州市职业大学 吴文化研究院, 江苏 苏州 215104)

摘要:两千多年以来,经历代文献记载且经现代考古印证的春秋晚期江南吴地地域历史文化学术体系,由“吴都”(吴大城)——苏州古城、春秋时吴国所建“离宫”——“木渎古城”及拱卫吴都的军事城堡——无锡“阖闾城”、昆山“南武城”等组成。其核心要素为经多部文献记载且为多次考古印证的论题——位于今苏州古城区的“苏州古城春秋时建、战国时重修”。这一论题亦为秦代于“故吴旧都”置会稽郡治“吴县”及1982年国务院下发《国务院批转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等部门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的通知》(国发〔1982〕26号)文件所附《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名单(二十四)》中有关苏州古城历史地位的定义为“春秋时为吴国都城”等所证明。1986年苏州庆祝建城二千五百周年时,无论国家层面,还是历史学界、考古学界等学术层面,对历史形成的上述学术体系均无异议。1989年后,史学界有学者对上述学术体系提出质疑和颠覆性意见:其一,春秋时吴国所建“木渎古城”为“吴大城”;其二,无锡“阖闾城”为“吴都”。在多种因素作用下,目前春秋“吴都”呈现“三都并峙”的局面,显现出舍弃王国维、李学勤等史学大家开启、提倡的“二重证据法”及“研究‘历史时期’以文献材料为主”等史学理论及史学传统后,江南史研究中出现的混乱。就此,文章对春秋“吴都”“三都并峙”状况的形成和发展进行梳理,并对2016年——苏州建城二千五百三十周年的庆祝提出对策展望,更从中国历史文化版图下的“吴都”这一视角,就江南史研究中春秋“吴都”“三都并峙”问题的破解提出意见。

关键词:江南历史文化;苏州古城;吴都;阖闾城;木渎古城;争议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931(2016)01-0002-27

一、基于春秋晚期江南吴地地域历史文化学术体系认定的苏州古城“春秋时为吴国都城”

(一)春秋晚期江南吴地地域历史文化延续千年的学术体系

苏州史(含苏州古代史、苏州先秦史等)的研究中,目前存有的最大争议为:春秋时吴国都城“吴大城”(阖闾城)的城址位置及与此相关联的苏州古城的始建年代问题。

这一争议,涉及两千多年以来,经历代文献记载且经现代考古印证的春秋晚期江南吴地地域历史文化学术体系(以下简称江南历史文化学术体系)。该体系由以下三部分组成:

1. 苏州城墙春秋时建、战国时重修。因此,该城墙围圈起的苏州古城(即文献记载的“吴大城”“阖闾城”)为吴国都城故址,其始建年代为二千五百余年前的春秋吴王阖闾之时。

2. 吴王阖闾时,除筑“吴大城”(阖闾城,即今苏州古城)外,还在“吴大城”周边分别建有离宫性质的今人所称的“木渎古城”(又称“灵岩古城”等)及建立战略纵深以加强外线防御的军事城堡,如无锡“阖闾城”和昆山“南武城”等。造筑目的,前者是为了吴王及吴国王室贵族的休闲享乐(其

收稿日期:2015-11-19

作者简介:吴恩培(1947—),男,江苏镇江人,教授,苏州市职业大学原吴文化研究所所长,现吴文化研究院总顾问,研究方向:吴文化。

引文格式:吴恩培.春秋“吴都”“三都并峙”现状与苏州古城历史文化地位的叙述——近三十年来有关苏州古城历史的争议述论兼及纪念苏州古城建城二千五百三十周年[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6,33(1):2-28.

间亦不排除于此处理公务)，后者则为拱卫吴都。

3. 苏州古城、“木渎古城”及无锡“阖闾城”、昆山“南武城”等均为建于春秋时期的吴国遗址、遗存。

(二) 考古与文献的相互关系及“二重证据法”

在考古学出现并引入中国之前的两千多年里，上述学术体系主要依赖于文献（含历代方志）的记载得以延续，如其中有关于苏州记载的《春秋经》《左传》《国语》等先秦文献，至今已两千余年。而在考古学引入中国后，因考古与文献记载的复杂关系，催生出了相应的学术理论：国学大师王国维1925年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编撰的讲义《古史新证》“总论”中首次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此为大师级学者在这一学术领域的理论建树。该“二重证据法”表述如下：“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1]1-3}

上述“纸上之材料”即传统的文献典籍，“地下之新材料”即考古发现的新材料，“二重证据法”就是研究文献典籍和考古材料相互关系的学术理论。该理论要点如下：

其一，“地下之新材料”具有对“纸上之材料”的“补正”和“证明”作用。即考古实证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如对春秋吴国而言，出土的铜器铭文补吴国文献之缺的实例有：

1. 安徽寿县西门出土的吴王光鉴，证实吴国与蔡国间存在联姻关系。

2. 河南固始侯古堆勾敌夫人墓出土的“宋公欒作其妹勾敌夫人季子媵簠”，证实吴王阖闾时期，吴国与宋国间存在联姻关系。

3. 现藏上海博物馆的传世器“馱叔乍吴姬簠”的铭文揭示吴王阖闾伐楚时，不仅与盟国蔡国进行了政治联姻，同时，还将另一位身份不详的吴国王室女子（即“吴姬”）嫁与胡国国君胡子豹。其后，胡国为楚所灭。这就是《左传·定公十五年》记载的：“吴之入楚也，胡子尽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楚灭胡。”^{[2]1606}而该器及其铭文证实了吴王阖闾时期，吴国与胡国间存在的联姻关系。

上述均无文献记载，但有考古实物，即考古实物以实证方式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

其二，“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即文献所记载的事件虽未得到考古出土实物的“证明”，但也不能对这一文献记载加以否定。此类情况甚多，如《左传·襄公十九年》记载鲁襄公曾将一只“先吴寿梦之鼎”^{[2]956}以及其他物件赠送给晋国的大臣荀偃。时至今日，此鼎已湮灭于历史之中。而欲以出土“先吴寿梦之鼎”来证实其记载的真实性，如果不是迂腐得近乎历史虚无，则就是意图以考古来争夺历史解释的话语权了。

其三，“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意指如果文献记载得到了考古实物的证明，互为印证，互相契合，则可“加以肯定”、可“断言”，即予以认定、肯定之意。

李学勤先生在《“二重证据法”与古史研究》一文中说：“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实际是对古史研究中历史学与考古学关系的表述。这里说的‘历史学’，是指利用文献记载进行研究的狭义的历史学。夏鼐先生对这个意义的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关系有著名的论述，他说：‘虽然二者同是以恢复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目标，是历史科学（广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犹如车子的两轮，飞鸟的两翼，不可偏废，但是二者是历史科学中两个关系密切而各自独立的部门。’（《夏鼐文集》（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1页）我认为就古史研究而言，这和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在精神上是相一致的。”^[3]在这篇文章中，李学勤先生还提出：“前些年，我曾在小著中介绍国际上近期流行的‘原史时期’（protohistory）的概念（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0页），‘原史时期’是介乎‘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间的阶段。研究‘历史时期’以文献材料为主，研究‘史前时期’以考古学、人类学方法为主，而‘原史时期’则文献、考古并重。中国的夏商西周三代，或许还包括更早一段，看来很适合这样讲的‘原史时期’。”^[3]

上述李学勤先生提出的三个时期划分及其相应的研究方法中的“历史时期”，当是从“西周”后的东周（春秋、战国）开始。这一时期，历史文献如《春秋经》《左传》《国语》等，都已出现。

必须指出的是，这一划分理论对指导当前的史学研究（包括处理本文所说的三个“吴都”并峙等）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故综合王国维、李学勤两位先生关于考古与文献相互关系的学术理论可以看出，对春秋时期的吴国史研究来说，首先当“以文献材料为主”；其次，也要注重“地下之新材料”所具有的对“纸上之材料”的“补正”和“证明”作用。

（三）文献、考古已证实的“苏州城墙春秋时建、战国时重修”

前及江南历史文化学术体系，其核心议题为现存苏州古城为春秋时的“吴都”（即吴大城、阖闾城）。由于苏州古城为古城墙围圈起的空间，故这一核心论题又等同于“苏州城墙春秋时建、战国时重修”的论题。

笔者曾在主编著作《苏州城墙》^[4]及论文《苏州城墙春秋时建、战国时重修之文献考释》^[5]、《文献典籍、考古材料相互关系下的苏州古城样本——兼及苏州城墙及苏州古城春秋时建、战国时修的考古印证》^[6]中对上述论题进行过论述。要点为：“苏州城墙春秋时建、战国时重修”的论题既有《春秋经》《左传》《国语》《史记》《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古代文献的记载，又有新中国建立后自1957年起的多次考古印证。

以文献记载来说，先秦时期最重要的史学著作《春秋经》《左传》中有四处“入吴”记载。“吴”，即春秋时的吴国都城——今苏州古城。其后的《国语·吴语》记载：“越王勾践，乃率中军泝江以袭吴。入其郛，焚其姑苏，徙其大舟。”^{[7]1604}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为：“夫吴，城高以厚，地广以深……”^{[8]2197}

因此，按照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之“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的论述，1957年的平门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相合，即可断苏州古城为春秋古城。故经1957年考古，苏州城的城址位置和建城年代，实际上已完成了它的学术论证。其后的多次考古（2005年平四路考古等）及考古发现（2011年苏州阊门北码头城墙战国遗址的发现等）仅不过再次印证上述学术结论而已。

所有这些，就是我们通常所说文献记载并经考古印证的“苏州古城为春秋时建、战国时重修”的传统史学观。它的学术稳定性，是建立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和李学勤“以文献材料为主”等理论基础之上的。

（四）学术认定基础上的国家行政认定——国务院文件关于苏州“春秋时为吴国都城”的定义

1981年12月28日，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和国家城市建设总局三部门，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并在请示中提议将北京等二十四个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作为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以加强管理和保护。苏州为其中之一，简述的入选理由为：“苏州，春秋时为吴国都城”等。1982年2月8日，国务院下发《国务院批转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等部门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的通知》（国发〔1982〕26号）以下简称“国发〔1982〕26号文件”，文件所附《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名单（二十四个）》中，苏州名列第五。国务院批准并公布时，有关苏州古城历史地位的定义即前述之“春秋时为吴国都城”。

上述国家行政认定，是建立在学术研究基础上对历史文化名城采取保护措施的国家行为。迄今为止，国务院于1982年、1986年和1994年先后公布了三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计九十九座城市。连同1961年至今所公布的七个批次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即通常所说的“国保”名单）等，共同构成了国家对历史文化名城及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的保护体系及保护机制。这一保护机制，也

分别为《春秋经·定公五年》《左传·定公五年》《春秋经·哀公十三年》《左传·哀公十三年》。

苏州市档案馆入藏该文件的相关信息为：卷宗：《中央领导同志和国务院有关保护苏州古城风貌和今后建设方针的部分批示、文件》，第24—26页，1984年1月21日，档案号：C1-1-332。

纳入了现行法律保护的范畴。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一章第十四条规定：“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城市，由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名城。”^{[9]272}

(五)秦置会稽郡治“吴县”体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政府对故吴旧都(吴都)即为“吴县”的行政认定

如果说“国发〔1982〕26号”文件中对苏州的定义为“春秋时为吴国都城”是体现今日中央政府的认定的话,那么秦王朝建立前夜的“始皇二十五年(前222)置”会稽郡^[10],并在故吴旧都(即“吴都”)置郡治“吴县”,则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政府在二千二百多年前对故吴旧都(吴都)即为“吴县”的行政认定。

春秋吴国亡于越国后,越“灭吴,徙治姑苏台”(《越绝书·卷第八》)^{[11]58}。姑苏台,代指故吴旧都,即今苏州。其后,“句践,大霸称王,徙琅玕,都也”(《越绝书·卷第八》)^{[11]58}。句(勾)践称霸之时,又将国都自苏州迁至琅琊(今山东胶南琅琊台西北)。勾践去世后,越国君位传数代后,据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引《纪年》曰:“翳三十三年迁于吴。”^{[8]1747}即越王翳三十三年(前379)时,越国又将都城自琅琊迁回吴——故吴旧都。楚灭越后,《史记·春申君列传》记载,楚春申君黄歇“因城故吴墟,以自为都邑”^{[8]2394},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注“吴墟”为“墟音虚。今苏州也”^{[8]2394},意即春申君把故吴旧都——今苏州——作其封邑。

由上可知,吴国灭亡后,故吴旧都即“吴都”曾两次为越国都城,其后又为楚春申君黄歇封邑的中心城市。

战国末期秦设会稽郡治“吴县”,其县名为“吴”的原因,如顾颉刚所指出的:“这地方的名称,称为吴县,从秦朝起,这因春秋之季吴国建都于此之故。”而以“吴”为名称的“吴县”“姑苏”与“吴都”的同一关系,向为史家采信,并构成史学界的主流意见。如:

范文澜《中国通史》:“寿梦死后,长子诸樊迁都吴(江苏吴县)。”^[12]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吴国的国都姑苏,在今江苏苏州。”^[13]

白寿彝《中国通史》记写黄池盟会时,“夫差正得意洋洋的时候,忽然听到越兵已乘虚进入吴的国都姑苏(今苏州)”^[14]。

杨宽《战国史》:“越王勾践灭吴后,国都曾迁琅琊(今山东胶南西南琅琊台),到公元前三七八年(越王翳三十三年)迁回吴(今江苏苏州)。”^[15]

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在论述“各国城邑的普遍兴起”时列举“当时著名的城市有”：“周天子的王城(今河南洛阳)……楚国的郢(今湖北江陵);吴国的吴(今江苏苏州);越国的会稽(今浙江绍兴)”^[16]等。

故此,“吴县”之名即从春秋“吴都”而来。秦设“吴县”,反映了秦始皇对故吴、故越的不同文化政策——故吴旧都的“吴”字保留与故越旧都的更名。《越绝书》中两次提及故越旧都的更名。对此,有学者指出:“秦始皇是亲自主持对于越的移民和更改其旧都‘大越’之名的。与当时作为会稽郡郡治的句吴旧都相比,句吴旧都仍保留‘吴’的名称,两者的区别就很清楚了。”^[17]

因此,秦始皇对故吴、故越执行了不同的文化政策——对故越,改其国都“大越”为山阴;而对故吴,则是在其旧都仍保留“吴”的名称。这使得春秋时的“吴都”(即“吴大城”“阖闾城”)与秦所设置的“吴县”之间,建立起了明确的继承关系,而联结这一文化传承的纽带就是“吴”字。

“吴县”的出现,意味着秦置“吴县”与其后的“苏州”名称长期等同或并存。在苏州的历史上,有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无“苏州”名称但“吴县”却始终存在。最近一次的情况为:1928年国民政府设苏州市,吴县为自治县。1930年废苏州市,并入吴县。是时,吴县即为苏州。甚至连沪宁线

顾颉刚《苏州的历史和文化》,见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苏州市档案局编:《苏州史志资料选辑》第2期(内部发行,1984年9月编印),第1页。

作者注:通行史学论著均注明“越王翳三十三年”为“公元前479年”。此处以原文为据。

上的火车站“苏州站”亦随之改名为“吴县站”(见图1)^[18]。故此,在没有“苏州”名称的日子里,吴县就等于苏州。更恰切地说,吴县就是苏州。



图1 苏州火车站,1936年改称“吴县站”

是故,秦灭楚而在故吴旧都置会稽郡治“吴县”时,故吴旧都既曾两次为越都,又曾为楚春申君封邑。且秦置“吴县”时,距吴、越灭国之时并不久远。因此,秦置“吴县”于故吴旧都时,不可能将这一故吴旧都(即吴都)的地望搞错。仅此,或已说明:早在秦王朝建立前后,吴县为“春秋时”“吴国都城”已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中央政府的行政行为所认定。这一行政认定,在两千多年后已成为历史的认定和学术的认定。

二、“三都并峙”现状的由来与发展

1986年苏州庆祝建城二千五百周年时,对学术界公认的“吴都”——苏州古城的城址及建城年代,从国家层面到学术层面均无异议。近三十年过去,却出现了包括苏州古城在内的三座同时期的吴国“都城”“都邑”。

(一)“三都并峙”前的苏州文化生态

1. 1957年:平门考古实际已完成对苏州古城文献与考古相契合的学术论证

在对文献记载的“苏州古城春秋时建,战国时重修”的当代考古印证中,1957年南京博物院主持的平门考古是苏州历史上最早一次由考古部门(南京博物院)进行的严格意义上的考古调查。在该考古调查基础上形成的考古学专业报告——《苏州市和吴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罗宗真执笔,以下简称《1957年考古报告》),刊于《考古》1961年第3期。这是有关苏州历史的最早的一篇考古学文献。其进行考古调查时,苏州城墙尚未拆去。因此,这次考古调查后,随着苏州平门“完全是土城”的城墙的消失,已无法再次进行考古。从这一意义上讲,它已不可复制。

《1957年考古报告》有如下叙述和结论:“苏州城四周外缘均环运河,内缘又环城河,城墙筑于两河之间,从吴国建城以来,其变迁不大,历代修城,只在原城基上再增筑。我们采集的遗物多半是城墙下层的,如果这一层是吴越建城时的城墙,那么这些遗物就是吴越时代的东西,而其中又以印纹硬陶最多,这就给印纹硬陶的时代问题提出比较可靠的证据。”“如文献记载说两地为春秋时代的越城及平门属实的话,则下层为新石器时代,上层为春秋末期无疑。所以,从已普遍发现为春秋战国时代的遗物来反证文献,同时也从文献记载来对证遗物,我们认为以几何形印纹硬陶为代表的遗址属于春秋战国时代是非常可能的。整个说来,本地区遗址的时代:新石器时代遗址约当西周至春秋时期,以几何形印纹硬陶为代表的遗址约当春秋战国时期。”^[19]

由此可见,1957年考古在平门的“城墙下层”发掘出了“约当春秋战国时期”的“印纹硬陶”^[19]等结论,与历代文献关于苏州古城建于春秋的记载相契合。按照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之“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11-3]的论述,故可断苏州古城为春秋古城。因此,经过1957年考古,苏州古城的城址、年代,实际上已完成了它的学术论证。

其后,由于对1957年考古的价值、意义等缺少足够认识,宣传不够,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否定苏州

城址位置及建城年代等观点有了合适的土壤。即使在今天，这一情况依旧，如以“苏州城墙”为展示主题的苏州城墙博物馆在“苏州城墙考古汇总表”中的“平门”栏内，1957年的平门考古就未被提及。

2. 1975—1976年：苏州平门城墙发掘中发现夯窝

据苏州博物馆《苏州平门城墙的发掘》一文记载：“一九七五年八月至一九七六年七月，苏州木材公司为了扩大木材堆放场地，经有关部门批准，对现苏州平门城墙进行推土平场。我馆配合这项工程的开发，对平门城墙进行了初步的勘察和发掘。”该文记写第三层堆积的情况为：“深1.3~2.82米，厚1.3~1.52米，为夯土层。土质细而纯，又很坚硬，用夯打实，层次平整。共计17层，每层厚度为8~10厘米。同时，在平面上有大量夯窝，呈圆形，直径约分别是4~6厘米。”“大量的六朝墓及两座唐墓均出自夯土层之上……我们在探沟中发现了17层平齐的夯土层，每层夯土层表面皆布有密集的圆口平底的夯杵痕迹。根据夯窝的大小、形状和分布密集的程度，看来这些夯窝有可能是用成捆圆棍作为夯筑工具夯打而成。从其夯土层的深度及以上一些迹象来推测，这夯土层应是早期城墙的建筑遗迹，最迟也在六朝以前。”

上述发掘未见城墙夯土标本或图片留存报道。在隔了三十年后的2005年，在几乎为同一地点的考古中，才留下了二号探沟夯窝的照片。

3. 1982年：苏州列入《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名单》

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中国城市科学学会理事长仇保兴先生在其撰写的《中国名城保护六十年》一文中说：“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初，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在城市建设中出现了忽视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致使部分城市格局和历史风貌受到损害的现象。在这种形势下，1981年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和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提出了将北京等24个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作为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1982年2月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批转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等部门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的通知》，公布了24座城市为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标志着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进入了有计划、成体系保护的阶段。”^[20]在“国发〔1982〕26号”文件所附《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名单（二十四座）》中，有关苏州古城的定义是：“春秋时为吴国都城，隋、唐为苏州治所，宋代为平江府。历来是商业手工业繁盛的江南水乡城市，与杭州齐名，并称‘苏杭’。保存着许多著名的古代园林，集中了我国宋、元、明、清建造的园林艺术精华。”上述对苏州“春秋时为吴国都城”的定义体现着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认定。

4. 1986年：历史学界、考古学界在苏州举办纪念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年学术讨论会

《吴越春秋·卷四》记载：公元前514年（吴阖闾元年，周敬王六年）吴王阖闾“委计”^{[21][25]}伍子胥建苏州城（即阖闾城、吴大城）。从公元前514年至1986年，苏州适逢建城二千五百年的整数年。按照民间逢整数当大庆的习俗，是时，相关学术机构和学术组织均在苏州举办了相应的庆祝活动。这些活动，均以苏州古城即今苏州城始建于春秋时期为学术基础。

这些由学术机构、学术组织举办的学术活动，分述如下：

（1）江苏省历史学会、苏州市历史学会和苏州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纪念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年学术讨论会

《苏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发表了署名“卫平”的《纪念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年学术讨论会在苏州大学举行》的学术简讯。简讯说：“1986年11月22日至25日，江苏省历史学会、苏州市历史

苏州博物馆（执笔：朱薇君）：《苏州平门城墙的发掘》，见苏州地区文化局、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苏州博物馆编：《苏州文物资料选编》，1980年9月，第77页。

同。

苏州博物馆（执笔：朱薇君）：《苏州平门城墙的发掘》，见苏州地区文化局、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苏州博物馆编：《苏州文物资料选编》，1980年9月，第82页。

学会和苏州大学历史系在苏州大学联合举办了纪念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年学术讨论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北京、上海、湖北、浙江和江苏南京、扬州以及苏州市的专家、学者一百余人。美国弗吉尼亚州理工学院暨州立大学教授王绰博士，我国著名学者唐长孺、沈起炜、茅家琦、祁龙威教授等也应邀到会。”简讯还指出：“这种以城市发展为中心内容的学术讨论会在全国还是首次。”^[22]

(2) 江苏省考古学会暨江苏省吴文化研究会举行纪念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年学术讨论会

江苏省考古学会暨江苏省吴文化研究会于1986年10月举行了纪念苏州建城2500年学术讨论会。署名“贺云翔”的《纪念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年学术讨论会——江苏省考古学会暨省吴文化研究会1986年学术年会纪要》发表于《江苏社联通讯》1987年第3期。文中说：“1986年10月21日至24日，江苏省考古学会暨省吴文化研究会在苏州召开了学术年会。与会代表有来自江苏、安徽、山东、江西、山西、陕西、浙江、广东、北京、上海等省市的专家学者共150多人，交流学术论文和资料80余篇……这次会议是为纪念苏州建城2500年而举行，所以大会讨论中心是在苏州城市史与吴文化两个方面。”^[23]由江苏省吴文化研究会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出版的《吴文化研究论文集》，即为这次会议的学术成果。《吴文化研究论文集》开篇即为中山大学教授商志禛撰写的《吴国都城的变迁及阖闾建都苏州的缘由——为纪念苏州建城2500年而作》，文中说到：“阖闾元年（公元前514年），使伍胥在姑苏‘造筑大城’，此即苏州城之纪年，目前已为学术界公认。”^[24]

5. “不见有人对苏州即阖闾故城一节提出任何疑问”

尽管张英霖《苏州古城为阖闾城的历史事实无可置疑——评析“苏州最早建于汉代”说的三点论据》一文发表于1992年，却是针对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新说的批驳。其文中附录当代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部分学者、教授对苏州古城即为阖闾城的看法时，曾在该文《后记》中说道：“在摘录以上材料时，极想把相反的意见也录几条，但找来找去没有找到，只好缺如。对于吴的历史记载，学术界不是没有疑点的，例如泰伯奔吴问题……但独独不见有人对苏州即阖闾故城一节提出任何疑问。”^[25]明确地指出了争议出现前对苏州古城历史地位的共识，可资佐证。

6. 结论

由上可知，在春秋吴都地望争议提出前的1986年——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年时，对“学术界公认”的吴都即苏州古城及其城址、建城年代，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历史学界、考古学界等学术层面，均无异议。史学家们取向的一致性，来自他们对苏州史研究的认知。

(二)“三都并峙”局面的形成

1. 1989—1990年：“新考”说出现——木渎灵岩山地区即为“吴大城”“阖闾城”

(1) 1989年：对“吴大城”城址的质疑——《春秋时代吴大城位置新考》发表
钱公麟的《春秋时代吴大城位置新考》发表于《东南文化》1989年第4/5期。

该文内容如标题所述，系对“吴大城”城址位置的“新考”。“新考”说由此正式出现。文中提出：“唐人张守节在《史记·吴太伯世家正义》中虽说‘至二十一代孙光，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但他仅说阖闾城在苏州地区，而没明指是在当时苏州城内。”^[26]

“本文首次认为今苏州城与《越绝书》中反映的吴大城不是同一城”，“《越绝书》中所描述的吴大城和以后文献中所阐述的阖闾城，也就是现在的苏州城决非是同一城”^[26]。并说：“宋人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城邑》中也透露了另一种不同看法；而流俗或传吴之故都在馆娃宫侧，非也’。这里，朱氏否定了‘流俗’的传言，而实际上可能这种‘流俗’中恰恰反映了一种事实。”^[26]将本被《吴郡图经续记》否定的意见，认定为“吴都”在木渎灵岩山这一结论的文献依据，从而把“吴大城”的城址位置锁定在了当时的“苏州地区”——其时的木渎及灵岩山地区属苏州地区下辖的吴县辖治——即吴县木渎灵岩山一带，并作结语“吴国统治者选择这一得天独厚之地筑都城，实在情理之中。”^[26]

编者注：应为“阖如”。此处以原文为据。

《春秋时代吴大城位置新考》从城址位置上否定了苏州古城为春秋时的吴大城、阖闾城,并指出“吴都”在木渎灵岩山地区。

其实,灵岩山“馆娃宫侧”的性质,是吴王休闲、避暑和处理政务的“离宫”。宋范成大《吴郡志》卷八记载:“石城,吴王离宫。”^{[27]98}又卷十五记载:“灵岩山,即古石鼓山,又名砚石山。董监《吴地记》:‘案《郡国志》曰:吴山(王)离宫在石鼓山……’”^{[27]206}即是。

(2) 1990年:对苏州古城始建年代的质疑——《论苏州城最早建于汉代》发表

刊于《东南文化》1990年第4期钱公麟的《论苏州城最早建于汉代》对苏州古城的建城年代又提出了质疑:“苏州城的始建时代是在汉代”,“战国时期苏州尚未建筑城墙”^[28]。从而与《春秋时代吴大城位置新考》一文观点构成了“新考”说完整的框架。

《论苏州城最早建于汉代》一文论点如标题所述,其主要论据为:

其一,城内发掘出众多汉代文化层遗址,且这些“汉代文化层大部分直接叠压在生土层上……这些材料有力地说明,苏州城在汉代确已初具规模”^[28]。

该文并没有对1957年平门考古已发现并得出的“以几何形印纹硬陶为代表的遗址约当春秋战国时期”^[19]的结论进行证伪。在这种情况下,只以城内的汉代文化层遗址为据,便显得立论不稳了。

其二,“城外的大量汉墓为说明汉代苏州城的确立提供了间接的证据”^[28]。

不说别的,此说法首先与该文撰者在《苏州考古》一书中的说法相悖:第一,苏州城外有东周墓。《苏州考古》中明确记载了“虎丘东周墓。1975年12月,在苏州虎丘公社新塘大队原‘千墩坟’上发现”^{[29]134}。该墓出土的春秋吴国铜器——铜鼎、铜盃——如今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第二,《苏州考古》中为强调位于吴县通安真山峰顶一号墓(即D9M1)的重要价值时,不仅说它“是苏南目前发现春秋时期的规格、级别最高的葬墓。根据发掘人员推断,其墓主为吴王寿梦”^{[29]128},甚至说该墓被楚人“政治性报复,并不是私盗”^{[29]115}式地盗掘过;还指说“严山遗存应该是吴国最后一代吴王夫差的陵墓”^{[29]130}。而《左传·哀公二十二年》明确记载越灭吴后,吴王夫差“乃缢。越人以归”^{[21]705},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注曰:“以其尸归。”^[30]指明越国军队把夫差的尸体运回越国了。

(3) 学者们对“新考”说的质疑与批驳

对吴大城城址位置和建城年代质疑的“新考”说,学者们纷纷予以质疑或进行批驳,如魏嵩山的《春秋吴国迁都苏州所筑城邑考》^[31]及《伍子胥所筑阖闾城究竟在哪里》^[32],吴奈夫的《春秋吴都研究的若干问题》^[33],林华东的《苏州吴国都城探研》^[34],张英霖的《苏州古城为阖闾城的历史事实无可置疑——评析“苏州最早建于汉代”说的三点论据》^[25]等。

从这些文章均发表于1991年至1992年亦可看出,它们对“新考”说的质疑与批驳有着强烈的针对性。如吴奈夫《春秋吴都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论述春秋时的苏州为“吴都”的历史地位时指出:“这几乎已成为历史的定论。”^[33]魏嵩山的《伍子胥所筑阖闾城究竟在哪里》则针对“新考”说的观点——“主张伍子胥所筑阖闾城不在今苏州城区而在今苏州城西南灵岩山侧”等——逐一批驳,并指出:“伍子胥所筑阖闾城在今苏州城区确定无疑。今苏州城西南灵岩山一带则为春秋吴国离宫所在,而非为阖闾城。”^[32]

2. 2002—2003年:论证木渎灵岩山地区为“吴大城”的考古及《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苏州西部山区春秋古城址群保护意见的通知》

(1) 2002年:论证木渎灵岩山地区为“吴大城”的考古——《苏州春秋大型城址的调查与发掘》发表
张照根的《苏州春秋大型城址的调查与发掘》发表于《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内容及论点

文章开头即说:“关于春秋晚期吴国都城吴大城的地望,在用文献资料不能完全确定的情况下,

除此书中的记载,尚有1980年苏州何山东周墓,出土的铜盃现为吴中区文管会收藏等。

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考古调查与发掘。”^[35]意图从考古入手，将“新考”说的论点——木渎灵岩山地区为“吴大城”——予以落实。于是，在该文中，春秋时吴国建造的离宫性质的灵岩山木渎古镇，就成为了取代苏州古城历史文化地位的“春秋大型城址”。

苏州西部灵岩山一带的考古，最早可追溯至刊于《考古通讯》1955年第4期朱江的《吴县五峰山烽燧墩清理简报》，该文以与灵岩山相连的吴县五峰山烽燧墩为考古调查对象。在当年的调查中，考古工作者不但发现了“几何印纹陶片”“几何印纹陶罐”“青瓷”等，且对这些遗存的性质、价值，该文从“春秋时期吴越之争甚剧，吴防越，在太湖筑墩据守”的时代背景下，提出了以下两个问题：“一、青瓷的年代将因此提早到东周，而几何印纹硬陶（与越城遗址相似）则定形为吴、越时期的产物（有人曾把几何印纹硬陶解释为新石器时代的）。二、几何印纹硬陶的年代可向下拖至六朝，与青瓷共存。”^[36]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该文指出：“这些问题，有待专家们来研究解决。究属何代，现虽不能解决其绝对年代，依据一切现象，可认为非六朝以后的军事建筑。由此可知，这些烽燧墩的发现，将是我们研究古代战略布署重要的实物例证。”^[36]

由此可见，早在1955年，就已有考古工作者在灵岩山一带进行过考古调查，并发现了“烽燧墩”“几何印纹硬陶”等古代遗存，并将之与“春秋时期吴越之争”进行了联系。而在1957年南京博物院的考古报告——《苏州市和吴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中，也提及了这一地区的“五峰山”及“灵岩山遗址”^[19]。

《苏州春秋大型城址的调查与发掘》完全可以在前人发现春秋遗址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查，以弄清其状况。

该文在描述木渎灵岩山地区的考古调查后，作结论说：“调查到的口碑资料涉及诸侯争雄、伍子胥营造、城的布局结构和城的攻破等情况，从一个侧面说明城址是吴国晚期的都城。总之，我们运用考古调查与发掘、采集口碑资料等手段寻找吴大城，已收到预想的效果，找到的春秋晚期城址在年代、规模、形制各方面均与有关文献记载的吴大城基本吻合。从而为最终解决春秋晚期吴国都城吴大城究竟在何处的历史疑案创造了条件。”^[35]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将1986年前学界对苏州古城即“吴大城”的毫无异议，在隔了十六年后描述成为“吴国都城吴大城究竟在何处”的“历史疑案”，从而使考古这一客观调查变成主观性的调查，使本次考古成为证实木渎灵岩山地区为“吴大城”的一次考古实践。

论证过程

该文中，不仅出现“春秋大型城址”等主观色彩强烈的用语，更看到“有关古城的民间口碑资料调查”（此处“古城”指的是灵岩山“春秋大型城址”，而非苏州古城）中“与春秋吴国有关，主要有吴王、伍子胥筑城，城门名称及吴、越、楚之间的战争等”的资料：“资料一：‘这个城墙是吴王跟伍子胥筑的，而且附近还有一个门叫巫门。’这条口碑资料反映了土岗的城墙性质，城门的名称与位置，表明古城遗址是当年吴国都城。资料二：‘那时候楚国从北面打过来，还有其他国家，有七国之争。’这条口碑资料反映了春秋末年诸侯争雄的局面，同时表明楚国曾从巫门攻打吴国都城。资料三：‘拿下白鹤顶，败了苏州城。’‘白鹤顶’是此处城墙东侧的小山狮子山的顶峰，高近40米，此处城墙紧靠狮子山脚，敌方只要占据白鹤顶就很容易攻入城内。这条口碑资料，一方面说明‘白鹤顶’下的城是‘苏州城’，另一方面说明城的设计者在选择地形时存在一个硬伤，造成后来‘城破国亡’。”^[35]

学术论文中对民间口碑资料进行搜集时应有的讲述人情况介绍、搜集地点和时间等规范要素均付阙如，既不知出于何人之口，也不知从何而来。且从常识来讲，口碑资料中提及的“七国之争”已属战国时期。至于“楚国从北面打过来”等，据《春秋经》《左传》等文献记载，春秋时期，楚国从没打到苏州近郊。而吴亡于越，越再亡于楚时或有“楚国从北面打过来”的可能，但其时已是战国时期。因此，这些“口碑资料”与该文作者所说的“与春秋吴国有关”显然悖悖。

此外，该文为论述“灵岩山东侧的惠家场土台群……可能是小城的宫殿区。对口碑资料的调查也有一定的收获，内容突出小城的宫城性质”时，引用的“口碑资料”是：“‘这是吴王的王宫，吴王和西施住在里边。’它直接反映了小城的王宫性质，同时说明小城的营造年代为春秋晚期。”^[35]

关于“西施”这一历史人物，几乎当代所有的历史学术著作中，都未将其与吴、越争战作联系。以“吴王和西施住在里边”来证明“小城的王宫性质”完全不足为据。

该文的矛盾之处在于，一方面说“用文献资料不能完全确定”从而抛开历史文献的记载，另一方面却又以一些新的“文献”——来源不清而又错误百出的所谓“口碑资料”作为论据，从而成为其立论的软肋。

学术影响

对建于春秋时期的木渎灵岩山地区进行考古，本无可厚非。但试图以这一“春秋大型城址”替代并覆盖苏州古城的历史文化地位，从而为“新考”说作考古证实则不能不让人质疑。

这一带有预设主题和目的的考古对苏州古城的最大伤害就是向外界释放出了错误的信息——经考古，在木渎灵岩山地区找到了替代并覆盖苏州古城的历史文化地位的“春秋大型城址”，从而导致学界尤其是考古学界对苏州古城城址和建城年代的错误认知，更导致了其后苏州周边文化生态的恶化。

(2)《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 苏州西部山区春秋古城址群保护意见 的通知》

2003年7月28日，苏州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向苏州市政府呈文，就“苏州西部山区春秋古城址群”提出保护意见。一个月后的8月28日，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以“通知”行文，予以批转。

对该通知及苏州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的呈文《苏州西部山区春秋古城址群保护意见》，有如下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苏州西部山区与春秋吴国本就有着密切关系，为春秋时期吴国建造的离宫性质的木渎灵岩山地区。因此，上述文件——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的通知及苏州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的呈文报告，强调“保护重要的历史遗存”及强调“苏州西部山区春秋古城址群保护意见”。

其二，上述文件并未认可《苏州春秋大型城址的调查与发掘》一文中木渎“这一带即为春秋晚期吴国都城吴大城的遗址”这一否定苏州古城历史文化地位的错误意见，而是以“苏州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及“苏州西部山区春秋古城址群是吴文化考古的重要发现，也是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内容”等语句，明确定义了二者间的关系，从而坚持了“国发〔1982〕26号”文件批转的《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名单》中对苏州古城的定义。

3. 2005年：苏州平四路考古成果及其对“新考”说的否定

(1) 2005年平四路考古及其成果

苏州市政公用局规划建设平四路垃圾中转站系市政府2005年实事工程，位于平门桥西约600米平四路北侧。为了处理好城市建设和文物保护的关系，摸清地下文物遗存的分布情况，为工程建设提供合理的选址，苏州博物馆受苏州市文物局委托，派出考古队于2005年6月27日至11月5日对平四路垃圾中转站工地进行调查和抢救性发掘。本次考古成果为署名“王霞、金怡、姚晨辰、周官清”的考古报告《平四路垃圾中转站抢救性发掘简报》（以下简称《2005年平四路考古报告》），刊于苏州博物馆编《苏州文物考古新发现——苏州考古发掘报告专辑（2001—2006）》一书，由古吴轩出版社2007年出版。

《2005年平四路考古报告》记述“第三期抢救性发掘”时提到：“在下挖三号探沟40厘米左右，发现坚硬黄土层分布，土中出有几何印纹陶片，根据其特征判断，时代为战国时期。为了弄清战国遗存和汉代城墙的关系，我们将二号探沟的北半部分与三号探沟地层同时下挖，发现汉代城墙叠压战国时期的黄土层，后经进一步的发掘，发现黄土层下有夯窝现象。在黄土层下发现战国时期的器物，其下为生土。苏州古城据文献记载具有2500年的历史，但是至今拿不出依据，这次汉代城墙下压的

有大片层叠夯窝的春秋战国时期夯土层的发现，非常重要。”^{[37]328}

“汉代城墙分地面和基槽两部分，基槽下挖破坏了战国文化层，战国文化层土质坚硬，我们在揭露时发现在两个层面下有夯窝现象，推测为人工堆筑并略经夯筑的遗迹，其下分布的五件陶器，是战国时代的遗物。”^{[37]328}

“二号探沟内汉代城墙下压的——层内陆续出土了一些几何印纹陶片、红褐色夹砂陶片、黑皮泥质软陶及原始瓷片。几何印纹陶中的麻布纹，规整的小窗格纹、小席纹以及黑皮软陶的出现等都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特征，这几层人工堆筑的层位应属战国春秋时期。”^{[37]330}

联系上下文来看，以上引文最后一句的“战国春秋”，或是为表达该“几层人工堆筑的层位”的年代顺序，或是“春秋战国”的行文笔误，但这并不影响“应属春秋战国时期”内容的表达。

这一段文字将平四路垃圾中转站处城墙的考古年代——春秋、战国——表述得非常清楚。

(2) 2005年平四路考古的特点、意义

首先，本次考古系苏州博物馆的苏州本土考古工作者所为。

其次，从时间上来看，是时已经出现否定苏州古城春秋时建、战国时修的“新考”说。因而考古报告中有如下一段话：“苏州古城据文献记载具有2500年的历史，但是至今拿不出依据，这次汉代城墙下压的有大片层叠夯窝的春秋战国时期夯土层的发现，非常重要。”^{[37]328}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参与此论考古的工作人员的使命感。前文所说，经1957年考古，苏州古城实际上已完成了它的文献及考古的“二重证据”学术论证。由于缺少宣传，连从事这一工作的专业人士都不了解这一情况，以致有“至今拿不出依据”的印象，这既反映了这些专业人士的焦虑，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有关方面对1957年考古的宣传做得十分不够。

再次，本次考古报告指出的“汉代城墙下压的有大片层叠夯窝的春秋战国时期夯土层的发现，非常重要”“土中出有几何印纹陶片，根据其特征判断，时代为战国时期”^{[37]328}，其重要性就在于，以考古实物形式清楚地表达了平四路古代城墙遗址的考古年代——春秋、战国，再次印证了文献关于苏州古城春秋时建、战国时重修的记载。

夯窝为夯杵夯土时留下的痕迹，其大小、形状等是断定夯土年代的重要标志，故各地文博、考古单位对表明自己城市建城年代的夯土层都极为珍惜。《2005年平四路考古报告》所附二号探沟夯窝照片，为我们留下了苏州古城的历史记忆。今苏州城墙博物馆展出的“早期城墙夯窝”实物标本，当为此次考古所留。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前引且已公开出版的本次考古报告——《2005年平四路考古报告》——中，已明确指出该“夯窝”的考古年代为“汉代城墙下压的有大片层叠夯窝的春秋战国时期夯土层”^{[37]328}，展出时，其年代竟变成了“晚于战国”（见图2）。



图2 苏州城墙博物馆展出的“早期城墙夯窝”实物标本（左）及该标本说明标牌（右）（2015年12月摄）

不知这一改动的依据是什么？“晚于战国”是指秦代，还是汉代？查阅文献后发现，“晚于战国”的表述出自《春秋时代吴大城位置再考——灵岩古城与苏州城》一文：“苏州城的城墙则晚于战国而早于三国，应该是汉代。”^[38]

我国1982年就制定了文物保护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一章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下列文物受国家保护：（一）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壁画。”^{[9]270}又，第三章第二十九条：“考古调查、勘探中发现文物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根据文物保护的要求会同建设单位共同商定保护措施；遇有重

要发现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及时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处理。”^{[19]273} 让人觉得遗憾的是，考古结束后，在这一已发现与苏州古城历史密切相关的重要遗址上，却建起了一座垃圾中转站。

平四路垃圾中转站位于平门桥西约 600 米平四路北侧，距平门不远，因此，这里的考古发现及成果与 1957 年“平门遗址”考古成果实是互为印证。同时，这两次考古发现本身就是以实证的方式对前述“苏州城的始建时代是在汉代”观点的否定。一座最早建于汉代的城，怎么可能发掘出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墙呢？

4. 2006 年：“新考”说的“再考”——春秋吴都地望争议的持续

2005 年平四路城墙考古之后，陆雪梅、钱公麟的《春秋时代吴大城位置再考——灵岩古城与苏州城》发表于《东南文化》2006 年第 5 期^[38]。

作为对“新考”说“再考”的该文，未正面回应平四路考古成果，却呼应了前述《苏州春秋大型城址的调查与发掘》一文。

该文内容如“内容提要”所说，是“论述了春秋吴大城应为灵岩古城，而苏州城始建于汉代”等前已出现的论点，其新意是首次提出了“灵岩古城”^[38]的概念。灵岩古城，即木渎灵岩山地区等，是同一概念的不同名称而已。“新考”说将之与“春秋吴大城”作对应关系，即“灵岩古城”就是文献记载的“春秋吴大城”。在这一论证逻辑之下，苏州古城成为与“吴大城”无关且“始建于汉代”的城市。

5. 2007—2008 年：外溢效应下的无锡“阖闾城从一个‘城’变成‘都城’”

(1) 无锡“阖闾城”——拱卫吴都的军事城堡

无锡阖闾城，据无锡现存最早的地方文献——元王仁辅纂至正《无锡志》记载：“阖闾城，在州西富安乡，相去四十五里。《越绝书》云：‘伍员取利浦及黄渎土筑阖闾城。’《吴地记》云：‘阖闾城，周敬王六年伍员伐楚还，运润州利湖土筑之，不足又取吴地黄渎土，为大小二城，当阖闾伐楚回，故因号之。’今按阖闾大城在姑苏，即今之平江是也。小城在州西北富安乡，闾堙其地边湖，其城犹在。”^{[39]54} 按此可知，无锡“阖闾城”为吴国伐楚归时建。故此处的“阖闾城”指的是阖闾时期所筑之城。而从上述《无锡志》记载亦可看出，它（指无锡“阖闾城”）在该《无锡志》中被称为阖闾“小城”，并以此与“在姑苏”的“阖闾大城”，即元代时的“平江”（今苏州）作区分。

其后，无锡的方志，如明弘治《重修无锡县志》、万历《无锡县志》，清康熙《无锡县志》等，均承袭元至正《无锡志》的记载。而明弘治《重修无锡县志》中，论述无锡沿革时，更以表格形式明确注明“周敬王六年”（吴阖闾元年，公元前 514 年）“阖闾城姑苏”^{[39]97}。

元至正《无锡志》中的“阖闾城”与明弘治《重修无锡县志》中的“阖闾城姑苏”，尽管均记作“阖闾城”，但内涵显然是不一样的。如前述，前者（元至正《无锡志》）“阖闾城”指阖闾“小城”，即与“在姑苏”的“阖闾大城”作对应；而后者（明弘治《重修无锡县志》）的“阖闾城”与“姑苏”相连，即指苏州古城。

无锡阖闾城的军事城堡性质，也获《无锡县志》《无锡市志》《无锡通史》等无锡当代史志的认可。

1994 年出版的无锡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无锡县志·卷二十五·第七章·文物胜迹》指出：“阖闾城遗址位于境内胡埭乡闾江村和武进县雪堰乡城里村之间。周敬王六年（前 514），伍子胥伐楚还师，吴王阖闾令他筑城。城筑成后，用吴王的名字命名，称阖闾城。距今已有 2500 余年。城为土城，弧形，仅筑东、南、西三面。……吴国在此筑城，有力地控制了军事要地，进可攻，退可守。”^[40]

1995 年出版的无锡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的《无锡市志·第七卷·胜迹》“阖闾城”条说：“周敬王六年（公元前 514 年）伍员（字子胥）伐楚还师，吴王阖闾令其筑城，故名。阖闾城土筑，弧形，仅筑东南西三面，北背大河。……是吴国的军事要地。越灭吴后，阖闾城失去军事意义，渐至荒废，杂草丛生。”^[41]

2003年出版的《无锡通史》在论述“吴越争霸战争”时，不但认为“自吴王诸樊时吴国都城自无锡迁苏州”，且对位于“今无锡胡埭镇湖山村和武进县雪堰桥镇城里村间”的“无锡阖闾城遗址”以加注形式指出：“从考古出土来看阖闾城是春秋时的城堡。”^[42]

(2) 与无锡“阖闾城”互为犄角，同为拱卫吴都的军事城堡性质的昆山“南武城”

关于昆山“南武城”，文献记载如下：

南宋范成大《吴郡志·卷第八·古迹》：“南武城，在海渚，阖闾所筑，以御见伐之师。”^{[27]107}

明王鏊《姑苏志·卷第三十三·古迹》：“武城，在昆山县西北。《汉书》‘娄县’注云：‘有南武城。’”

《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十二·古迹》：“武城，在县西北，《汉书·地理志》注‘娄县’，有南武城，阖闾所起，以候越。”

(3) 南北军事城堡分别防御楚、越的军事职能

上述无锡“阖闾城”，扼守吴都苏州（即吴大城）之西北，为吴国伐楚归时建，显然是为防御楚国的报复而建，毕竟历史上楚国曾两次深入吴国腹地的今南京、镇江一带。其一为公元前570年（吴寿梦十六年，鲁襄公三年），“春，楚子重伐吴，克鸠兹，至于衡山”（《左传·襄公三年》）^{[2]823}。楚军在子重统帅下攻克了吴国的城邑“鸠兹”，一直打到吴国腹地“衡山”。蒋赞初《南京地名考略》一文说：“最早出现于历史上的金陵地名是‘衡山’，位于江宁县的南部。”^{[43]272}而楚军“伐吴，克鸠兹（今芜湖市）至于衡山，可见该处是南京地区最早的古战场”^{[43]272}。另一为公元前538年（吴馀昧六年，鲁昭公四年）楚国主导的申地盟会，夏天刚开完盟会，秋天时楚灵王就对吴国动手了。“秋七月，楚子以诸侯伐吴……使屈申围朱方。”（《左传·昭公四年》）^{[2]1202}朱方，今江苏镇江市东丹徒镇南。

而阖闾时建并扼守吴都苏州（吴大城）东南的昆山南武城，其军事目的即为上引《昆新两县续修合志》所说的“候越”——防御越国。

因此，两座军事城堡，一西北，一东南，互为犄角，防御对象各有侧重，但共同承担着拱卫吴都的军事职责。

(4) 2007—2008年：《阖闾城遗址的考古调查及其保护设想》发表

“古都梦圆”与考古复查及其成果

就在苏州为古城的城址、年代的不同意见论争之时，相邻的无锡开始了如《阖闾城揽胜》一书所说的“古都梦圆”之历程。据该书第三篇“古都梦圆”说：“2007年，无锡市抓住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契机，聘请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张敏带队，开始对阖闾城遗址进行第四次考古复查。”^{[44]87}

2008年，张敏《阖闾城遗址的考古调查及其保护设想》（以下简称《无锡考古调查》）一文发表于《江汉考古》2008年第4期。该文开头即指出：“阖闾城遗址位于无锡市和常州市交界处，分属无锡滨湖区胡埭镇和常州武进区雪堰桥镇……考古勘探的结果确认了阖闾大城的存在，大城东西长约210米，南北宽约1400米，面积约2.94平方公里，年代与小城相同。”“初步推断阖闾城遗址为春秋时期吴王阖闾的都城。”^[45]

《无锡考古调查》文献引用、解读分析

《无锡考古调查》对文献的引用、解读极不规范。其不规范处的指向性极强。

a. 引唐张守节文时删去“今苏州也”的技术处理及对无锡“阖闾城”的望文生义

《无锡考古调查》说：“根据文献的记载，吴国都城名‘句吴’或‘吴’，如楚都数迁仍名‘郢’一样，吴国都城虽多次迁徙，然其都城始终名‘句吴’或‘吴’。阖闾城亦名‘吴城’，虽然唐代出现了‘阖闾城’之名，然又称‘筑阖闾城都之’。从阖闾城的城名分析，阖闾城应为吴国都城。”^[45]

引自王鏊：《姑苏志》，苏州方志馆藏本。

引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苏州方志馆藏本。

这里姑且不论先秦史籍中吴国都城名称只称为“吴”，从无以“句吴”称为吴都者，而仅就其所说“根据文献的记载”，“唐代出现了‘阖闾城’之名，然又称‘筑阖闾城都之’”等，系引自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原文如下：“吴，国号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孙寿梦居之，号句吴。寿梦卒，诸樊南徙吴。至二十一代孙光，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8]1445}

两相对比可看出，《无锡考古调查》撰者在引用该文献时，删掉了“今苏州也”四个关键字。

而《无锡考古调查》所说“从阖闾城的城名分析，阖闾城应为吴国都城”，显系望文生义。“阖闾城”之意有二：一为阖闾所造且以阖闾之名命名的都城。《越绝书》卷第二记载“吴大城”的规模及城门后所说“阖庐所造也”^{[11]9-10}即是。《无锡考古调查》所引唐张守节《史记正义》的表述：“二十一代孙光，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8]1445}亦是。而前引明弘治《重修无锡县志》中，“阖闾城姑苏”，亦是。

二为阖闾时期所筑之城。如前引南宋范成大《吴郡志·卷第八·古迹》：“南武城，在海渚，阖闾所筑。”《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十二·古迹》：“武城，在县西北，《汉书·地理志》注‘娄县’，有南武城，阖闾所起。”等等，均是。

显然《无锡考古调查》作“从阖闾城的城名分析，阖闾城应为吴国都城”的联想，实为望文生义。

b. 引《史记·吴太伯世家》时的选择性引用及其被省略的“败之姑苏”“报姑苏也”

《国语·吴语》记写越军“袭吴，入其郛，焚其姑苏”^{[7]604}句中的“姑苏”，指阖闾建、夫差续建的姑苏台，后作苏州别名、代称。“姑苏台”与春秋时吴国都城相伴而生，这是一个无法移动的地理座标。

《无锡考古调查》引《史记·吴太伯世家》说：“《史记·吴世家》：‘阖闾十年春，越闻吴王之在郢，国空，乃伐吴……阖闾十九年夏，吴伐越，越王句践迎击之槁李。’显然阖闾筑城迁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进攻越，因而阖闾城既表现出都城的布局 and 规模，又表现出强烈的军事性。”^[45]

《史记·吴太伯世家》原文如下：阖闾“十年春，越闻吴王之在郢，国空，乃伐吴……（阖闾）十九年夏，吴伐越，越王句践迎击之槁李。越使死士挑战，三行造吴师，呼，自到。吴师观之，越因伐吴，败之姑苏，伤吴王阖庐指，军却七里。吴王病伤而死。……（夫差）二年，吴王悉精兵以伐越，败之夫椒，报姑苏也。”^{[8]1467-1469}

一经比较，则可看出《无锡考古调查》剪裁掉的是记写阖闾城与苏州紧密联系的关键词语——“败之姑苏”与“报姑苏也”。

《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的此轮吴、越争战，其地域范围与吴都——“姑苏”有着密切关联，与太湖北岸的军事城堡——无锡“阖闾城”——毫无关系。

c. 引《吴越春秋》时的张冠李戴

《无锡考古调查》说：“根据文献记载，吴王阖闾‘兴乐石城’，因此分布于龙山山脉的石城应名‘石城’。”^[45]

此句所说之“文献”为《吴越春秋》。其原文如下：“立射台于安里，华池在平昌，南城宫在长乐。阖闾出入游卧，秋冬治于城中，春夏治于城外，治姑苏之台。旦食鼯山，昼游苏台，射于鸥陂，驰于游台，兴乐石城，走犬长洲，斯止阖闾之霸时。”（《吴越春秋·卷四》）^{[21]48}

从上文中的“城中”“城外”“姑苏之台”等语可见，此段文字记写的是阖闾在吴都（今苏州）的一段生活情景。其中的“兴乐石城”句，元徐天祐音注时指出：“在吴县西南三十里，有姑苏山，亦名姑胥。”^{[21]48}前引宋范成大《吴郡志》卷八：“石城，吴王离宫，越王献西施于此城。”^{[27]98}又卷十五：“灵岩山，即古石鼓山，又名砚石山。董监《吴地记》：‘案《郡国志》曰：吴山（王）离宫在石鼓山，越王献西施于此山。……’《越绝书》云：‘吴人于砚石山作馆娃宫。’刘逵注《吴都赋》引杨雄《方言》云：‘吴有馆娃宫，吴人呼美女为娃……’又云：‘砚石山有石城，去姑苏山十里，阖闾养越美人于此。上有两湖，湖中有苑充贡。’按：此即今灵岩山。”^{[27]206}而与“兴乐石城”勾连的“走犬长洲”句，《吴郡志》卷八：“长洲，在姑苏南、太湖北岸，阖闾所游猎处也。……长洲苑，《旧经》云：‘在县西南七十里。’”^{[27]105}

由上可知,《吴越春秋》“兴乐石城”句的地理背景即为苏州,与无锡“阖闾城”并无关系。

d. 小结

上述《无锡考古调查》引用文献时的极不规范,显示其考古结论之文献印证、支撑的缺乏,使其考古结论的学术性、严谨性大受影响。

(5) 2008年:“江苏无锡阖闾城遗址”入选“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与“无锡阖闾城遗址全国考古专家论证会”

如上所述,在文献引用并不规范,考古结论缺乏文献印证、支撑的情况下,《无锡考古调查》还是得出结论说:“考古勘探的结果确认了阖闾大城的存在,大城东西长约210米,南北宽约1400米,面积约2.94平方公里,年代与小城相同。”“初步推断阖闾城遗址为春秋时期吴王阖闾的都城,建议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阖闾城遗址’的名称可改称‘阖闾故城遗址’或‘吴都阖闾城遗址’。”^[45]

上述“考古勘探的结果确认”的确定性与“初步推断”的不确定性,形成了事实上的矛盾。

2008年3月,含“初步推断阖闾城遗址为春秋时期吴王阖闾的都城”考古结论的“江苏无锡阖闾城遗址”入选由国家文物局主办的“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08年9月10日在无锡举行的“无锡阖闾城遗址全国考古专家论证会”上,“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组长黄景略代表专家组在无锡宣布,无锡‘阖闾城遗址’可初步认定为公元前515年—公元前496年之间春秋时期一代吴王阖闾的都城,并建议把无锡阖闾城遗址申报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4]93}

地处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常州市武进区的“阖闾城遗址”于2013年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下简称“国保”),国务院公布时的相关信息见表1:

表1 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有关“阖闾城遗址”的相关信息

序号	编号	名称	时代	地址
151	7-0151-1-151	阖闾城遗址	春秋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常州市武进区

显然,国务院公布时,并未采用《无锡考古调查》所建议的名称——“阖闾故城遗址”或“吴都阖闾城遗址”,也未采用专家组所建议的“无锡阖闾城遗址”,而是为地处无锡、常州,并由两市共有的“阖闾城遗址”。

这是目前唯一列入“国保”名单的春秋吴国遗址,从而成为同样具备申报“国保”名单潜质的苏州古城、苏州木渎古城及昆山南武城等的可援之例。

据《阖闾城揽胜》记载,当时的无锡市委书记“在阖闾城考古工作汇报会上曾动情地说了一段话:今天,我和大家的心情一样,非常地喜悦。我们有了新的发现,阖闾城从一个‘城’变成‘都城’,提升了它的地位,也延长了无锡建城的历史。”^{[44]107}

在“国发〔1982〕26号”文件公布的二十四座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关于苏州古城的定义明确指出:苏州“春秋时为吴国都城”。这一结论,是由侯仁之、郑孝燮和单士元等专家进言,经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和国家城市建设总局采纳,并获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批准的学术界通行的意见。其间或其后,不排除因新材料的发现,导致当初(1981年)上述三家呈文单位上报且经国务院批准的意见明显有误,则应履行相关行政审批程序进行纠编。其他任何个人或单位宣布的意见都无行政约束力。

(6) 打造“吴都”的过程

尽管进入“国保”名单时并未被冠以“吴都”名称,但无锡投入巨资建筑的“吴都阖闾城”工程已然开工进行了。

无锡在其境内兴建名为“吴都阖闾城遗址”及“春秋吴都·阖闾城”的建筑,不妥之处有二:

如专家组在无锡宣布无锡“阖闾城遗址”“初步认定”为“吴王阖闾的都城”,则意味着“苏州”就不该是“春秋时为吴国都城”了。

一是在无文献依据、无行政批文的情况下，自命“吴都”；二是撇开该历史文化资源的共享者常州，试图资源独享。

在大兴土木造筑“吴都”之际，无锡也开始构建其“吴都”城墙的学术体系。虽然无锡“阖闾城”只是如《无锡考古调查》所说的“面积约2.94平方公里”的袖珍小城，但在《阖闾城揽胜》的叙述中，它也有了八个城门，不仅与苏州古城（即吴大城、阖闾城）的城门数目相同，名称竟也相同。

仅以距今一千五百年前的唐代《吴地记》^[46]记载的苏州八城门与当代《阖闾城揽胜》记写的无锡“阖闾城”八城门作一比较，详见表2。

表2 唐代《吴地记》所载苏州八城门与当代《阖闾城揽胜》记写无锡“阖闾城”八城门比较

文献	记载对象	记载内容
《吴地记》	苏州八城门	<p>阖门 亦号破楚门。吴伐楚 大军从此门出。陆机诗曰：“阖门势嵯峨，飞阁跨通波。”又孔子登山，望东吴阖门叹曰：“吴门有白气如练。”今置曳练坊及望舒坊，因此……</p> <p>胥门 本伍子胥宅 因名。石碑见在。出太湖等道水陆二路，今陆废。门南三里有储城 越王贮粮处。十五里有鱼城，越王养鱼处。门西南有越来溪。</p> <p>盘门，古作蟠门。尝刻木作蟠龙，镇此以厌越。又云水陆相半，沿洄屈曲，故名盘门。又云，吴大帝蟠龙，故名。门内有武烈大帝庙，在祀典。东南二里有后汉破虏将军孙坚坟，又有讨虏将军孙策坟。</p> <p>蛇门南面，有陆无水。春申君造以御越军。在巴地，以属蛇，因号蛇门。</p> <p>匠门，又名干将门。</p> <p>娄门，本号驷门。东南，秦时有古驷县。至汉王莽改为娄县。</p> <p>齐门北通毗陵，昔齐景公女聘吴太子终累，阖闾长子、夫差兄也。齐女丧夫，每思家国，因号齐门。后葬常熟海隅山东南岭，与仲雍周章等坟相近。</p> <p>平门，北面有水陆通毗陵。子胥平齐大军从此门出，故号平门。东北三里，有殷贤臣申公巫咸坟，亦号巫门。西北二里有吴偏将军孙武坟。</p>
《阖闾城揽胜》	无锡“阖闾城”八城门	<p>阖闾城设有八个陆门和八个水门，以代表天之八风——东北炎风、东方条风、东南熏风、南方巨风、西南凉风、西方颼风、北方寒风——和地之八卦——乾、坤、震、艮、离、坎、兑、巽。</p> <p>地之西南两座城门称盘门和蛇门。盘门象征水之盘曲折弯。设蛇门是因为越国在吴国南偏东方，属巳方，属蛇。城门上刻一条木蛇，头向城内，表示越臣服于吴。</p> <p>城之北面两座城门称齐门和平门。设齐门是因为齐国在其北。设平门是因为北伐齐国的水陆大军均从此出发。</p> <p>西面两座城门称阖门和胥门，是为了沟通西北方天庭紫微宫的阖闾之气和胥塘之气。后来吴军破楚归来，阖闾一度下令将阖门改为破楚门。</p> <p>东面设立娄门和匠门。设娄门是为了聚东方娄水，匠门后改为相门。</p> <p>伍子胥用了三年积聚，五年施工，前后共八年时间，方始将阖闾城建造成功。</p>

由表2可以看出，二者高度相似。苏州古城的城门，有历代文献记载，传承有序，且仍现存并相继修复。这些城门，极具历史文化内涵。而无锡“吴都阖闾城”城门并无文献记载，一经比照，结论自出。

如《阖闾城揽胜》说无锡“阖闾城”的“西面两座城门称阖门和胥门”。就“阖门”而言，其唯一性决定了它向为苏州古城的标志性建筑。历代以来，这一标志性建筑上留下诸多文化积累，其中著名者为唐代白居易《登阖门闲望》诗。而明王世贞《登岱》诗：“依微白马吴阖在，欲向秋风问羽翰。”^[47]用了孔子、颜回的“吴阖白马”之典故。关于该典，北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记载为：“传孔子登泰山，东望吴阖门，叹曰：‘吴门有白马如练。’因是立名。”^[48]今泰山有“望吴圣迹”牌坊，即传孔子登泰山，望吴阖门处。难道这“望吴圣迹”望的是无锡“吴都阖闾城”的“阖门”？

再说“胥门”，唐代《吴地记》早已记载“胥门，本伍子胥宅，因名”^[46]¹⁷，这座城门与苏州古城的建造者伍子胥紧紧联系在一起。而苏州娄门，其名称对应者有二：一对应太湖入海“三江”之一的娄江（另二为现尚存的松江（吴淞江）和已湮塞的东江）。娄江，出太湖，穿苏州娄门而东，一路迤迤百余里，由刘家港（今太仓浏河）入海。太仓上溯至太湖胥口为娄江，自太仓以下又称浏河。

[唐]陆广微：《吴地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17—30页。

林杉：《阖闾城揽胜》，古吴轩出版社，2013年出版，第26—27页。

二对应娄县。如《吴地记》所说：“娄门，本号嚳门。东南，秦时有古嚳县。至汉王莽改为娄县。”^[46]^[27] 娄县，即今昆山。自秦代实行郡县制，处于娄江中段的昆山，有七百多年被称为“娄县”，而太仓则历来有“娄东”之称。所有这些，地理上均与无锡无关，但《阖闾城揽胜》竟强解为无锡“阖闾城”“设娄门是为了聚东方娄水”。这里的“娄水”为何？若是指太湖宣泄入海的娄江，然娄江与无锡在地理上并无关系，此其一。其二，这“娄水”又如何“聚”法？对无锡“阖闾城”来说，再怎么“聚”，也不能把苏州娄门所对应的娄江及昆山（娄县）、太仓（娄东）等“聚”到无锡去。

仅从上述，已足以看出无锡“吴都阖闾城”抄袭了苏州城门名称。但苏州这些城门的历史渊源和地理含义是无法照抄的。

体现一座城市的历史及其定位，只能是如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所说的“纸上之材料”和“地下之新材料”综合的结果。专家可以给出“都城”之类的“建议”或“结论”，但记载这些历史细节且流传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文献，是无法“给出”的，也是无法编造和篡改的。

(7) 形成苏、锡二市争夺“吴都”态势的原因

形成苏、锡二市争夺“吴都”态势的原因很多，其一为一些考古人员并不专业的工作精神（如对文献的非专业剪裁等），其次为某些专家不专业、不恰当的言论，其三为苏州内部关于“吴大城”地望的争论及苏州市对能印证自身历史文化地位的考古成果（如1957年、2005年考古成果）宣传不够等等。

正是上述原因形成的合力，导致了苏、锡二市对“吴都”的争夺。

6. 2010—2011年：“木渎古城”考古及“吴大城”地位的再次认定

(1) “木渎古城”考古的背景

如前文述，这一时期种种非理性学术因素导致了对苏州古城历史文化地位的激烈冲击和空前压力。见诸报端的如“以前我们所知的无锡建城史，从汉代开始，然而现在一下子推到了春秋，而且比苏州古城还要早了一点点”^[49]，“阖闾死后，夫差才迁都至苏州，‘所以，伍子胥建的阖闾都城，是在无锡常州交界的这里。苏州古城，应该叫夫差都城。’”^[49]等等非学术、非理性的言论，既助推了无锡对“吴都”的争夺，更构成了对苏州古城历史文化地位的否定和打压。

在苏州周边文化生态极度恶化的情况下，苏州市的各级领导、学者、市民理所当然地对苏州古城的历史文化地位产生忧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苏州市考古研究所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了该所2009年成立以来的木渎春秋古城考古。

(2) “木渎古城”考古概况

时间及考古地域

自2010年起，苏州市考古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木渎五峰村北城墙、城壕遗址和新锋村南水门遗址等五处地点进行考古发掘。

考古成果

该考古公开发表的相关成果如下：

a. 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苏州市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苏州古城联合考古队署名的《江苏苏州市木渎春秋城址》（下文简称《木渎考古报告》），发表于《考古》2011年第7期，执笔者为：徐良高、张照根、唐锦琼、孙明利、付仲杨、宋江宁。

b. 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苏州市考古研究所联合考古队”署名的《苏州木渎古城考古的主要收获》，发表于2011年《苏州文博论丛》（总第2辑）。

上述成果，内容大致相同，故本文分析、论述以前者《木渎考古报告》为主。

c. 2010年：“江苏苏州木渎古城遗址”入选“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0年6月，含“初步认定苏州西南部山区木渎、胥口一带山间盆地内存在一处大型遗址，其性质为一座春秋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这一学术结论的“江苏苏州木渎古城遗址”入选由国家文物局主办、中国考古学会协办、中国文物报社承办的“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3)《木渎考古报告》分析

考古性质

《木渎考古报告》称：“苏州木渎古城考古项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苏州市考古研究所为了解苏州市木渎盆地及其周边地区古城址、墓葬等遗址群的时代、布局、性质和人地关系等一系列学术问题而联合对苏州西部山区及周边地区先秦时期遗存进行的综合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50]这是由苏州地方出资的一个考古项目。

成果内涵

从《木渎考古报告》可看出，此次考古标的物并非今苏州老城区的“苏州古城”，而是“苏州市木渎春秋城址”。

《木渎考古报告》说：“对于吴国都城究竟位于何处，学术界过去的研究仅限于文献记载和古人的注释，以及民间口传历史，认为即在今苏州市区。近代考古学兴起后，从考古证据方面来探求文献记载的吴都之所在成为学界期盼。但在苏州市区多年的考古工作中并未发现先秦时期的城墙、城门、大型建筑等与城址有关的遗存，学者们对今苏州市区即吴都之所在的说法提出质疑。”于是，“学者们将探寻吴都的视线转向了东周遗存密集分布的苏州西部山区。”^[50]

上述《木渎考古报告》的“并未发现”即“苏州市区多年的考古工作中并未发现先秦时期的城墙、城门、大型建筑等与城址有关的遗存”的论断，轻率且武断。

首先，它没有回应苏州考古实践中已发现的先秦时期的城墙等与城址有关遗存的种种事实，如前述1957年的平门遗址考古、1975年8月至1976年7月在苏州平门城墙发掘中发现的夯窝、2005年平四路城墙遗址考古所发现的“大片层叠夯窝的春秋战国时期夯土层”等。

其次《木渎考古报告》中的上述结论，与1989年后的“新考”说关联紧密。兹分类列表进行对比，详见表3、表4、表5。

由表3、表4、表5的比较不难看出，《木渎考古报告》中涉及苏州古城内容的相关表述乃至文字，都与“新考”说提出者文章中的语句极为相似。

同样，《木渎考古报告》也引用了南京博物院1957年的考古资料，如“城内发现的公园遗址”^[28]等，并说：“早在1957年，在灵岩山一带的考古调查中就发现春秋时期遗物，说明存在这一时期遗址。”^[50]但对该考古报告中“平门遗址”等直接与该文观点相悖的材料，亦一概不提。

7. 2011年：阊门北码头等古城墙的考古勘探及其发现

(1) 阊门北码头等古城墙的考古勘探及其发现

就在《木渎考古报告》发表前一个月的2011年6月，阊门北码头古城墙下发现战国时堆积层的消息见诸报端。

一个月后，《木渎考古报告》发表并发出“并未发现”的论断。

阊门北码头古城墙考古勘探的发现，出自苏州纸媒报道。

《苏州日报》

2011年6月17日《苏州日报》发表的《苏州阊门北码头古城墙下发现战国时堆积层》一文说：“苏州阊门北码头古城墙下发现战国时期堆积层！这是从昨天在南园宾馆举行的‘苏州吴越文化考古座谈会’上传来的消息。座谈会由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发起，来自苏浙皖沪等地的十余位考古专家学者各抒己见，就吴越文化考古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座谈会上，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还就苏州阊门北码头古城墙考古勘探调查与发掘作了专题报告。据介绍，为了配合苏州古城墙修复工程及木渎春秋古城考古工作，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分三期对阊门北码头、平门及相门段古城墙进行考古勘探。日前，考古工作人员对阊门北码头古城墙选取三段进行了考古勘探。据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介绍，阊门北码头城墙以土为主，混有砖块及石灰渣，主要修筑于明清时期。在对其中一段城墙进行剖面分析时发现，城墙上几层为明代堆筑，其余的土层均为战国

时期的。”^[51]

表3《木渎考古报告》与“新考”说诸文中关于文献记载论述的比较

文献	记载内容
钱公麟：《论苏州城最早建于汉代》（《东南文化》1990年第4期）	关于苏州城的始建年代，过去都往往依据文献资料，认为始于春秋时代的阖闾大城。
张照根：《苏州春秋大型城址的调查与发掘》（《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关于春秋晚期吴国都城吴大城的地望，在用文献资料不能完全确定的情况下，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考古调查与发掘。
《木渎考古报告》（即《江苏苏州市木渎春秋城址》，《考古》2011年第7期）	对于吴国都城究竟位于何处，学术界过去的研究仅限于文献记载和古人的注释，以及民间口传历史，认为即在今苏州市区。

表4《木渎考古报告》与“新考”说诸文中关于城址位置论述的比较

文献信息	记载内容
钱公麟：《春秋时代吴大城位置新考》（《东南文化》1989年第4/5期）	宋人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城邑》中也透露了另一种不同看法：“而流俗或传吴之故都在馆娃宫侧，非也”。这里，朱氏否定了“流俗”的传言，而实际上可能这种“流俗”中恰恰反映了一种事实。
陆雪梅、钱公麟：《春秋时代吴大城位置再考——灵岩古城与苏州城》（《东南文化》2006年第5期）	关于苏州城是否曾是春秋晚期吴都的问题，首先提出质疑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东南文化》上刊登的《春秋时代吴大都位置新考》、《苏州城最早建于汉代》及《吴大城与列国都城比较》等文章，提出了苏州城不是春秋晚期吴国都城——吴大城。10多年过去了，随着对古城址考古的进一步深入，人们对古城址认识有了新的提高。2000年苏州博物馆考古部的同志在航测图的启示下，终于在灵岩山侧发现了面积甚大的春秋时期城址遗存，并在同年苏州博物馆与吴中区文管会联合进行了抢救性试掘，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灵岩古城的发现在学术界、社会上引起了争论。传统的观点认为，苏州城即阖闾大城，是吴国在阖闾元年筑的都城所在地，城址2500多年来一直延续，没有变化。 苏州城与灵岩古城应该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城址。到底它们谁是春秋时代的吴大城呢？……春秋战国时期，阖闾造都城于灵岩山侧，完全符合当时军事战争的需要。
张照根：《苏州春秋大型城址的调查与发掘》（《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今日苏州城以西木渎一带，有许多古代遗留下来的长条形土岗及方形或长方形台地。经考古调查、发掘和采集口碑资料，初步可知这一带即为春秋晚期吴国都城吴大城的遗址。
《木渎考古报告》（即《江苏苏州市木渎春秋城址》，《考古》2011年第7期）	1989年，钱公麟先生首次提出阖闾所建吴大城不在今苏州市区，而在西南郊木渎一带的山间盆地。2000年，苏州博物馆考古部通过考古调查，在灵岩山侧发现了大量的长条形土墩和长方形土墩，总长绵延数千米，并初步判断其为一处古代大型遗址。2001年春，对3处长条形土墩进行了试掘解剖，根据土墩结构和出土印纹陶片的时代，初步推测其为春秋晚期城墙。以上这些成果为进一步探索吴都所在提供了重要线索。 目前可初步认定苏州西南部山区木渎、胥口一带山间盆地内存在一处大型遗址，其性质为一座春秋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

表5《木渎考古报告》与“新考”说诸文中关于建城年代论述的比较

文献信息	记载内容
钱公麟：《论苏州城最早建于汉代》（《东南文化》1990年第4期）	本文认为，苏州城的始建时代是在汉代。
陆雪梅、钱公麟：《春秋时代吴大城位置再考——灵岩古城与苏州城》（《东南文化》2006年第5期）	苏州城应该是汉代的城址，大量的考古材料完全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 灵岩古城的城墙年代为春秋晚期城墙，而苏州城的城墙则晚于战国而早于三国，应该是汉代。
《木渎考古报告》（即《江苏苏州市木渎春秋城址》，《考古》2011年第7期）	在苏州市区多年的考古工作中并未发现先秦时期的城墙、城门、大型建筑等与城址有关的遗存。

《姑苏晚报》

同日(2011年6月17日)《姑苏晚报》发表的《阊门北码头城墙遗址发现战国堆积层》一文也说：“昨天，为配合苏州古城墙修复工程而进行的阊门北码头古城墙考古有了新发现，一段长约300米的明代古城墙直接‘跨’在了一段战国堆积层上。据市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介绍，在苏州现存的古城墙遗址中，阊门一带的地表上有三处遗存。不久前，考古人员针对此三处遗存进行了勘探调查与发掘。在总共8个工作点上，考古人员对B段北端的5号点、南端的2号点以及A段的3号点进行了挖掘。5号点城墙段南北走向，最高处约8米，宽约12~14米，东部是居民区的围墙，西部是明朝城墙外

包的石条。地表以下的明代土层并不太厚，其下就是高约5米的战国堆积层。‘因为从这个堆积层中发现了战国时期的印纹陶片，所以初步判断这个堆积层的时代为战国。’考古项目的负责人表示，在过去针对苏州古城墙的考古勘探与调查中，曾经在平门和相门古城墙遗址处发现了汉代城墙与水城门的遗迹。此次在城墙遗址中出土战国时期印纹陶片，尚属首次。”^[52]

上述报道中“考古项目的负责人”所说的“此次在城墙遗址中出土战国时期印纹陶片，尚属首次”，其实并不准确。无论是前文介绍的1957年南京博物院所做的平门遗址考古，抑或是2005年苏州本土考古工作者所做的平四路垃圾中转站抢救性考古发掘，都曾发现过印纹陶片。

(2)《苏州日报》《姑苏晚报》报道分析

综合上引两报报道及《木渎考古报告》，可见如下事实：

其一，对阊门北码头等古城墙的作为是一次“考古勘探”行为。

其二，“考古勘探”成果揭示阊门北码头古城墙与“战国时期的印纹陶片”和“战国堆积层”有联系。

其三，成果发布或披露是在“苏州吴越文化考古座谈会”这一正式学术会议场合。

其四，“考古勘探”的目的是“为了配合苏州古城墙修复工程及木渎春秋古城考古工作”。这意味着此次“考古勘探”既与“苏州古城墙修复工程”有联系，也与“木渎春秋古城考古工作”有联系。

其五，“考古勘探”的时间当在2011年4月苏州城墙相门段、阊门北码头段、平门段修复工程正式开工前。也就是在《木渎考古报告》在《考古》2011年第7期发表前三四个月。

其六，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对阊门北码头等古城墙“考古勘探”的成果“发现”与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参与撰写的《木渎考古报告》的结论性意见“苏州市区多年的考古工作中并未发现先秦时期的城墙、城门、大型建筑等与城址有关的遗存”明显相悖。

(3) 阊门北码头古城墙下“考古勘探”发现“战国时堆积层”的意义

这一次为配合苏州古城墙修复工程而进行的“考古勘探”有些仓促，至今尚未见相关考古报告。然而，其考古成果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上述报道中所称的“高约5米的战国堆积层”等。如今，它或许已重新固化在北码头修复的城墙之中。对苏州城墙和苏州古城来说，它是标明其出生年代的一处可查验的实证。它的存在就是对前述“苏州城的始建时代是在汉代”学术观点的否定，也是对《木渎考古报告》中“并未发现”论断的否定。

从考古印证的角度来看，本次“考古勘探”的发现，与1957年平门城墙考古、2005年平四路城墙考古一起，共同组成了印证“苏州古城春秋时建、战国时重修”这一论点的考古证据链。

(4) 2012年：阊门北码头城墙考古的后续发展——北码头城墙的年代“战国时期”，被悄悄修改为含义模糊的“早期”

《中国文物报》2012年11月23日刊登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组写的《苏州地域考古的新探索》一文，对上述2011年阊门北码头古城墙考古作了新的表述：“2011年，我所对阊门北码头段城墙进行了保护性发掘，发现该段城墙保存较好，地面还保存有部分早期古城墙城垣或基础，也反映出不同时期古城墙的改建、重修过程。”^[53]这里，原先“战国时期”的年代表述，被修改为含义模糊、并不专业的“早期”。

这种对能印证苏州古城春秋时建、战国时修的阊门北码头古城墙“战国堆积层”的刻意回避，引发了人们的忧虑。

这一“为了配合苏州古城墙修复工程及木渎春秋古城考古工作”的苏州阊门北码头古城墙的“考古勘探”结束后，迄今已至少四年以上；苏州城墙修复工程竣工，亦已近四年，但“配合”的“考古勘探”的“考古报告”却迟迟未见。相比之下，《木渎考古报告》在考古后次年即发表于《考古》杂志。

8.《木渎考古报告》之后续

(1) 苏州的支持与“并未发现”及“集体二等功”

《木渎考古报告》记载，该项目的实施得到了“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胥口镇及穹窿山风景

区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50]。而前述《苏州地域考古的新探索》一文中也说“因发现了木渎春秋古城等，‘苏州市政府特授予苏州市考古研究所‘集体二等功’荣誉”^[53]。但其时的苏州媒体并未有任何报道。

2010年6月，含“并未发现”及“初步认定苏州西南部山区木渎、胥口一带山间盆地内存在一处大型遗址，其性质为一座春秋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等学术结论的“江苏苏州木渎古城遗址”入选“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其中的“并未发现”论流散全国。兼之木渎考古成果在中国考古学界的权威刊物《考古》上发表，这使得苏州古城历史地位受影响的程度，一下子提高了几个量级。

今年是苏州建城二千五百三十周年，值苏州古城历史地位因被损害而重构之际，必须以审慎的态度认真面对《木渎考古报告》造成的影响。

(2) “初步推测”与“进一步探索”

对木渎古城与春秋“吴大城”的关系，即木渎古城是不是春秋“吴大城”，《木渎考古报告》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初步推测其为春秋晚期城墙……为进一步探索吴都所在提供了重要线索。”“目前可初步认定苏州西南部山区木渎、胥口一带山间盆地内存在一处大型遗址，其性质为一座春秋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50]

首先，这里的“初步推测”及“为进一步探索吴都所在提供了重要线索”等，所表达的结果的不确定性，不言而喻。而可以明确的是，“初步推测”的前提是否定苏州古城的历史地位。

其次，就目前已见底的文献而言，没有哪一部记录过这刚刚发掘出的所谓春秋时期的“木渎古城”，有记录的只是春秋时期木渎灵岩山的吴国离宫。

因此，没有文献记载为“吴都”的木渎春秋古城，与有文献记载的“吴都”苏州春秋古城相比，在同样有“地下之新材料”的情况下，谁更接近真实？

(3) 此处与彼处的“几何印纹陶片”

《木渎考古报告》中共有六处涉及“几何印纹陶片”，均分别冠以“东周时期”“不会早于春秋晚期”“春秋晚期”^[50]等修饰语，以表明年代。

相比之下，1957年平门考古、2005年平四路城墙考古也均发现了“几何印纹陶片”。但这些考古发现都被《木渎考古报告》以“并未发现”而一笔勾销。

(4) 文献记载的苏州八城门在“木渎古城”如何印证

以“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的“木渎古城”覆盖甚至替代春秋苏州古城，其困难之处在于无法将文献记载中的地名与木渎山区考古处的地名一一对应，如文献中的平门、阊门、盘门等。

“为进一步探索”时，对应不了，还可等待。若是长久以往一直对应不了，文献的“排异”作用又逐渐显现，木渎考古仅靠那些无文字的“地下之新材料”，其替代并覆盖苏州古城历史地位的前景堪忧。

(5) 对春秋吴国离宫性质的木渎古城并没有不可接受的理由

和“无锡阖闾城”面临情况相同的是，即使给“木渎古城”一个“吴都”的名号，它也同样承受不起，盖因其被拔高至“吴都”地位后难以与文献“接轨”。因此，作为既有文献记载，又有考古证明的春秋吴国离宫性质的“木渎古城”，身份明确，学界无异议。

这一吴国离宫性质，与灵岩山上的“吴王井”等古迹相得益彰，对发展当地旅游经济并非不是利好。如前文述，今后若以“木渎古城”的名义援例申报相应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直至申报“国保”单位，倘获成功，对“木渎古城”及当地来说，也是个很不错的结局。

(三) “三都并峙”——苏州古城“春秋时为吴国都城”的历史地位之争

1. 并峙的三座“吴都”及其数据分析

并峙的“三都”，面积或大或小，分别如下：苏州古城，面积“14.2平方公里”^[54]；无锡“吴都阖闾城”，“面积约2.94平方公里”^[45]；木渎“都邑”性质的大城，“总面积达24.79平方公里”^[53, 55]，被称为“春秋超大型城址”^[56]。

以春秋时期一流强国楚国的都城——郢都——的建造作为对比样本，至吴王阖闾伐楚，攻入郢

都时，郢都城及其城墙的建造时间已历百年。再以今楚纪南城遗址（即楚郢都城）为标尺作比较，“城内面积约16平方公里”^[57]。

由此可以看出：

伍子胥造筑的苏州古城，面积约为楚郢都城的89%，可谓面积相当而略小。

无锡“吴都阖闾城”，面积仅为楚郢都城的18%。即当时造筑的这一“吴都”，连郢都城面积的五分之一都不到，很难设想伍子胥造筑出这么个袖珍小城。这与吴王阖闾“兴霸成王”的雄图大略不成比例，其作为军事城堡，面积倒大致相当。

“都邑”性质的木渎古城，其面积竟为郢都城面积的1.5倍。这意味着在吴王阖闾、夫差总共执政才四十二年的吴国，用了不及楚国一半的时间，造出了比楚郢都面积大一倍半的“春秋超大型城址”。另需指出的是，阖闾时期，吴国经历了十余次外战、内战；夫差时期，吴国也经历了十余次对外战争。而对外争战交手的对象，包括了春秋时期的晋、楚、齐、秦四个强国以及宋、卫、鲁、越、邾、陈等十余个诸侯国。因此，在吴王阖闾、夫差执政的四十二年中，吴国几乎每两年就历经一次战争。姑且不论必要性，即使从可能性的角度来看，在吴国屡经战争的背景下，吴国国力如何能支撑而造出三座“吴都”更如何能在用不及楚国一半的时间造出三个且其中一个比楚郢都面积大一倍半的都城？

以上数据分析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在现今三座“吴都”并峙的现象中，存在着非理性浮夸。

2. “三都并峙”的根本指向

1989年迄今发生的关于苏州古城建城年代及其城址位置的争议，其实质是对文前述及之江南历史文化学术体系的质疑和颠覆。无论“木渎古城”是春秋“吴大城”，苏州古城只是建于汉代的城市的观点；还是春秋时期所建的无锡“阖闾城”是“吴都”的观点，二者均意图从苏州古城手中夺得“吴都”的历史文化地位，但又缺少相应的文献支持；同时，既无法对记载苏州古城历史地位的“纸上之材料”进行证伪，也无法对证实苏州古城历史地位的“地下之新材料”进行证伪，于是二者均对历代文献记载和当代考古印证，事实上已完成其学术论证的苏州古城讳莫如深，从而成为二者学术挑战时的软肋和硬伤。

前者虽系苏州学者的内部争议，但其对苏州古城历史文化地位的伤害显而易见。更值得注意的是其外溢效应——引发后者的第三方诉求意见出现，从而使得吴都“吴大城”的论争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态势。

无锡现存最早的地方文献及历代方志，以及无锡的当代史志等，均已对“无锡阖闾城”的军事城堡性质作过记载和论述，其历史上从未与“吴都”有过任何联系。近十年里出现的无锡“阖闾城”对“吴都”的争夺状况，对真正的学术研究构成了挑战。

由苏州内部争论引发的外溢效应的发酵，又引发苏州再作出反应。2011年《木渎考古报告》下的苏州古城“并未发现”和“初步认定”木渎古城为“春秋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的结论，与前述“无锡阖闾城遗址全国考古专家论证会”上“初步认定”的“吴王阖闾的都城”，有着相同特点，这就是：其一，整个过程均由考古学者垄断话语权；其二，考古结论均因无历史文献支持，故均为不确定的“初步认定”；其三，针对的目标，均为据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已完成其学术论证的“吴都”——苏州古城。再从更高的角度来看，二者均试图对文献记载且延绵数千年的江南历史文化学术体系进行颠覆。

文献记载是历史形成的，它客观存在且不受后世任何功利影响。而对春秋时期的考古，一旦缺少文献支撑，则很容易成为有目的的主观活动。上述两个不同地区由不同考古部门各自作出的考古结论，实为互相抵牾。一说无锡“阖闾城”为“吴都”；另一说则指春秋时期吴国的木渎古城为“都邑性质的城址”。当两个考古结论形成矛盾时，立刻显现出原有的学术体系遭到破坏后所出现的混乱局面。由此再来看前文所引王国维、李学勤先生的学术理论的重要性，一旦抛开这些学术理论，必导致无序的纷争。“吴都”之争及形成的“三都并峙”尴尬局面，仅不过是一个典型样本而已。还

需要指出的是，“三都并峙”期间，前述1982年国务院批准的“国发〔1982〕26号”文件并未废止亦未停止执行。

文献记载和常识告诉我们，吴国阖闾时期既没有、也不可能，更无必要同时建三个“吴都”。“春秋时为吴国都城”的苏州古城之认定，是因为：历史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就赋予了她这一“吴都”地位。而构筑其这一地位的坚实学术基础，首先是如上所述为《春秋经》《左传》《国语》《史记》《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古籍的记载认定，其次是1957年苏州平门考古、2005年平四路考古等成果的印证。

有文献记载，且有学界通行规则“二重证据法”下的“文献”与“考古”相合，苏州古城“春秋时为吴国都城”的历史地位，其实是谁都争不去的。之所以形成目前争议的原因极其复杂，亦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史学界掀起的“翻案风”有关。在这股“翻案风”中，一些原来在历史上早有定论的历史人物、事件，又被一些学者拿出来炒作，加上一些“独特”的观点后被赋予了“新”的历史定义，苏州古城的历史也不能幸免。

近三十年过去，对苏州古城历史文化地位的质疑，依然无法撼动这一江南历史文化学术体系，无法撼动由文献、考古支撑的苏州古城的历史文化地位。

苏州古城的历史不会受制于任何主观意愿，当时间使“吴都”之争变得平和，对她的多元描述也终究会摒弃任何功利目的回归历史本身，回归两千多年来历代文献记载且经现代考古印证的江南历史文化学术体系本身。

然而，论争是如何而起，苏州古城在自身的文化保护中有何经验和教训，今后苏州古城文化保护的方向和目标等，却不能不加以深入探讨。这种探讨，既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后人负责，更是对苏州古城负责。论争所触碰的可是苏州古城历史文化的灵魂和根脉！

三、三座“吴都”并峙的非正常现象与中国历史文化版图下的“吴都”审视

(一) 列入“国保”名单中的春秋列国故城及其分析

从1961年至今所公布的七个批次的“国保”名单中可以看出，春秋时期列国故城可分为如下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以《史记·齐太公世家》所说“周室微，唯齐、楚、秦、晋为强”^{[8][149]}的“周室”及“四强”名单为序，其中的东周王城及齐、楚、秦、晋等国故都均列入“国保”名单。晋、楚等由于春秋时迁都情况，不止一处。其名单见表6。

表6 “国保”名单中第一层次的春秋列国故城汇总

国别	名称	时代	今址	批次(年份)	备注
周室	洛阳东周王城	东周	河南洛阳	第七批(2013)	
齐	临淄齐国故城	周	山东淄博	第一批(1961)	
楚	楚纪南故城	东周	湖北荆州	第一批(1961)	楚国都城“郢都”故址之一
	楚皇城城址	东周至秦、汉	湖北宣城	第五批(2001)	
秦	秦雍城遗址	东周	陕西凤翔	第三批(1988)	
晋	侯马晋国遗址	东周	山西侯马	第一批(1961)	
	曲村—天马遗址	周	山西曲沃、翼城	第四批(1996)	东周时，曲沃、翼城均曾为晋都

第二层次：以鲁、郑、宋、卫等重要诸侯国之故城列入“国保”名单，见表7。

表7 “国保”名单中第二层次的春秋列国故城汇总

国别	名称	时代	今址	批次(年份)	备注
鲁	曲阜鲁国故城	周	山东曲阜	第一批(1961)	
郑	郑韩故城	东周	河南新郑	第一批(1961)	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及韩国都城遗址
宋	宋国故城	周	河南商丘	第六批(2006)	
卫	卫国故城	周	河南淇县	第六批(2006)	

第三层次：以春秋时期的姬姓封国等诸侯国，如虞、蔡、郟、邾、杞、偃阳、黄、滑、轶、邓等国故址、故城列入“国保”名单，见表8。

表8 “国保”名单中第三层次的春秋列国故城汇总

国别	名称	时代	今址	批次(年份)	备注
蔡	蔡国故城	西周、春秋	河南上蔡	第四批(1996)	
虞	虞国古城遗址	周	山西平陆	第七批(2013)	
郑	郑国故城	周至汉	山东鄆城	第六批(2006)	
邾	邾国故城	周至汉	山东邹城	第六批(2006)	
鄆	鄆国故城遗址	周、汉	山东苍山	第七批(2013)	
杞	杞国故城遗址	春秋至汉	山东潍坊	第七批(2013)	
偃	偃阳故城	周至晋	山东枣庄	第六批(2006)	
黄	黄国故城	周	河南潢川	第六批(2006)	
滑	滑国故城	周	河南偃师	第六批(2006)	
番	番国故城遗址	东周	河南固始	第五批(2001)	
轶	轶国故城	周	河南济源	第六批(2006)	
邓	邓国故址	周	湖北襄樊	第六批(2006)	
邶	邶国故城	商、周、汉	河南沁阳	第七批(2013)	
蒋	蒋国故城	西周至战国	河南淮滨	第七批(2013)	
鄆	鄆国故城	东周	河南鄆陵	第七批(2013)	
沈	沈国故城	春秋至汉	河南平舆	第七批(2013)	
刘	刘国故城	春秋、汉	河南偃师	第七批(2013)	
罗子	罗子国城遗址	东周	湖南汨罗	第七批(2013)	

第四层次：在第一、二、三层以下的春秋时期的一些诸侯国城池、大夫封邑及军事城堡等，也相继列入“国保”名单，见表9。

表9 “国保”名单中第四层次春秋列国故城汇总

国别	名称	时代	今址	批次(年份)	备注
卫	戚城遗址	春秋	河南濮阳	第四批(1996)	春秋时卫国孙文子(孙林父)封邑。《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季札访卫时，“自卫如晋，将宿于戚”。后“闻钟声焉……遂去之”。
楚	叶邑故城	周	河南叶县	第六批(2006)	《左传·昭公十八年》：“叶在楚国，方城外之蔽也。”
鲁	南武城故城遗址	春秋至南北朝	山东平邑	第七批(2013)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游(言偃)既已受业，为武城宰。”
鲁	费县故城遗址	春秋、汉、北魏	山东费县	第七批(2013)	春秋时为鄆邑，鲁“三桓”季氏私邑(采邑)。
吴	阖闾城遗址	春秋	江苏无锡滨湖区、常州武进区	第七批(2013)	元《无锡县志》：“阖闾城，在州西富安乡，相去四十五里。《越绝书》云：伍员取利浦及黄渚土筑阖闾城。《吴地记》云：‘阖闾城，周敬王六年伍员伐楚还，运润州利湖土筑之，不足又取吴地黄渚土，为大小二城，当阖闾伐楚回，故因号之。’今按阖闾大城在姑苏，即今之平江是也。小城在州西北富安乡，阖闾其地边湖，其城犹在。”

(二) 中国历史文化版图下的“吴都”审视与分析

1. “遗址”与“都城”

从上表可以看出，表6至表8所列均为该国春秋时故都或故址，而表9所列为非故都的“遗址”。

表9中所列春秋吴国“阖闾城遗址”出现在2013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七批“国保”名单中，其只是作为地处“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常州市武进区”的春秋遗址而入列。无锡在其辖区境内据此而造筑无锡“吴都阖闾城”，既是对兄弟城市常州的不尊重，更是对国务院公布的第七批“国保”名单其相关定义的扩大与滥用。主管部门应对此情况进行干预。

2. 目前已公布的“国保”名单中，春秋时期地处东南的吴、越故都无一入列

上述名单中，另一个值得注意和深思的现象是：春秋时期地处东南的吴、越二国故都，至今无

今襄阳。

一入列“国保”名单。是吴、越二国地位太低，不够资格么？答应显然是否定的。对吴、越二国在春秋时的地位，以现存文献记载的三份春秋“五霸”名单为视角，则可看出：三份名单中，出现三次的为：齐国（齐桓公）和晋国（晋文公）；出现两次的为楚国（楚庄王）、秦国（秦穆公，又作秦缪公）、宋国（宋襄公）和吴国（吴王阖闾、吴王夫差）；出现一次的为越国（越王句（勾）践）。

因此，上述问题，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或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都显得极不平衡。

对越国故都的情况，本文不便越俎代庖，当由浙江相关地区的行政部门和学者自行阐释。本文主要对春秋吴国故都情况作一阐释。

商周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均在黄河流域，故其时以与地处黄河流域的王畿（即国都）的距离之远近，分为“五服”“九服”，对边远地区则均以“蛮服”“荒服”称之。且这一时期，对中原地区的四边，向蔑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到了春秋晚期，掌握历史话语权的鲁国史官在《春秋经》《左传》中，对地处长江下游的吴国“蛮夷”文化的歧视可谓比比皆是。尤其是春秋晚期吴王夫差北进，对鲁国施加文化窘迫及军事入侵，从而把鲁国纳入吴国的势力范围，并迫使鲁国参与攻伐齐国等，使得孔子这位儒家代表人物都对吴国并无好感。二千五百多年后的今天，当然绝不会出现再以春秋鲁国史官的思维方式来对待吴国及其故都的状况，但当我们今天以中国历史文化版图为背景对“吴都”问题进行审视时，会发现前述“三都”并峙情况及吴、越故都无一入列“国保”名单的情况似乎显示出了某种不平衡。

因此，如果“吴都”经评审程序入列今后批次的“国保”名单，这将是解决上述问题包括春秋吴国“三都并峙”问题的最好契机和选择。

3. 加强苏州古城保护，制定申报“国保”目标

吴国故都“三都并峙”的不正常情况，终将得以解决。吴、越故都未列入“国保”名单的不平衡，其实是为苏州古城作为“吴都”申报“国保”名单预留了空间，也提供了可能。毕竟，春秋时期的历史，是中国南北诸侯国家冲突、交融的历史，春秋吴国，缺不得位。其间，作为吴国离宫的“木渎古城”故址，也具备申报“国保”名单的条件。

苏州古城作为“吴都”申报入列“国保”名单，倘若获批，则既意味着拨乱反正，更意味着经历史文献记载且经现代考古印证的江南历史文化学术体系的重新确立。

因此，苏州适时制订苏州古城保护目标——以“苏州吴国故城”等名称申报入列“国保”名单，可说是苏州古城保护之切实可行的措施之一。当然，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做许多工作。

苏州籍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是苏州古城保护的第一位建言人。早在1951年苏州市政府召开的由各界人士和社会贤达出席的春节座谈会上，顾颉刚先生即以“苏州城之古为全国第一，尚是春秋时物”，“苏州城殆因予言而得保存乎？是所望也”^[58]等观点，向主持会议的苏州市长提出了保护古城的建议。

（三）2016年苏州的对策展望

2016年为苏州建城二千五百三十周年。三十年前的1986年10月15日上午，中共苏州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和市政协在公园会堂隆重举行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年纪念大会。值建城二千五百三十周年之际，苏州依然当以此为契机，举行建城纪念大会。而举行纪念大会的目的和要达到的目标为：

其一，表达苏州坚持古城历史文化地位的的决心和意志，坚持国务院“国发〔1982〕26号”文件对苏州历史文化地位的认定及其对苏州古城保护的精神。

三份名单如下：1.《吕氏春秋·当务》：“备说非六王五伯。”高诱注：“五伯，齐桓、晋文、宋襄、楚庄、秦缪也。”2.《荀子·王霸》：“虽在僻陋之国，震动天下，五伯是也……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句践，是皆僻陋之国也，震动天下，强殆中国。”3.《汉书·诸侯王表》：“故盛则周、邵相其治，致刑错；衰则五伯扶其弱，与共守。”颜师古注：“伯读曰霸。此五霸谓齐桓、宋襄、晋文、秦穆、吴夫差也。”

其二,借此公开宣布苏州古城以“吴都”申报入列“国保”名单的举措,既为破解地处东南的吴、越故都无一列入“国保”名单的不平衡状况提供契机,同时,也有助于“吴都”“三都并峙”不正常状况的破解,有助于江南历史文化学术体系的重构与恢复。毕竟,近三十年中,这一学术体系已遭受极度破坏,而重构与恢复是需要一些事件作为标志的。

谨以此文纪念苏州古城建城二千五百三十周年。

参考文献：

- [1] 王国维. 古史新证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4.
- [2] 春秋左传正义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3] 李学勤. “二重证据法”与古史研究 [J].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22(5): 5-6.
- [4] 吴恩培. 苏州城墙 [M].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12.
- [5] 吴恩培. 苏州城墙春秋时建、战国时重修之文献考释 [J].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2, 29(5): 5-12, 84.
- [6] 吴恩培. 文献典籍、考古材料相互关系下的苏州古城样本——兼及苏州城墙及苏州古城春秋时建、战国时修的考古印证 [J].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3, 30(1): 4-20.
- [7] 国语 [M].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校点.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 [8] 司马迁. 史记 [M]. 裴骃, 集解. 司马贞, 索隐. 张守节, 正义.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9]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新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法规全书(2013年版): 行政法类(3) [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3.
- [10] 顾颉刚, 史念海. 中国疆域沿革史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64.
- [11] 袁康, 吴平. 越绝书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 [12] 范文澜. 中国通史: 第1册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8: 122.
- [13] 李学勤. 东周与秦代文明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120.
- [14] 白寿彝. 中国通史: 第3卷(下册)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1035.
- [15] 杨宽. 战国史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279.
- [16] 顾德融, 朱顺龙. 春秋史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245.
- [17] 陈桥驿. 于越历史概论 [M]// 陈桥驿. 吴越文化论丛.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24-25.
- [18] 老苏州. 百年历程: 上卷 [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87.
- [19] 南京博物院(罗宗真执笔). 苏州市和吴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 [J]. 考古, 1961(3): 151-159.
- [20] 仇保兴. 中国名城保护六十年 [J]. 中国名城, 2009(9): 4-7.
- [21] 赵晔. 吴越春秋 [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
- [22] 卫平. 纪念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年学术讨论会在苏州大学举行 [J].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7(1): 118.
- [23] 贺云翔. 纪念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年学术讨论会——江苏省考古学会暨省吴文化研究会 1986 年学术年会纪要 [J]. 江苏社联通讯, 1987(3): 9-11.
- [24] 商志禛. 吴国都城的变迁及阖闾建都苏州的缘由——为纪念苏州建城 2500 年而作 [M]// 江苏省吴文化研究会. 吴文化研究论文集.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8: 1.
- [25] 张英霖. 苏州古城为阖闾城的历史事实无可置疑——评析“苏州最早建于汉代”说的三点论据 [M]// 石琪. 吴文化与苏州.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2: 121.
- [26] 钱公麟. 春秋时代吴大城位置新考 [J]. 东南文化, 1989(4/5): 137-142.
- [27] 范成大. 吴郡志 [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
- [28] 钱公麟. 论苏州城最早建于汉代 [J]. 东南文化, 1990(4): 67-70.
- [29] 钱公麟, 徐亦鹏. 苏州考古 [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0.
- [30] 杜预. 春秋经传集解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1842.
- [31] 魏嵩山. 春秋吴国迁都苏州所筑城邑考 [J]. 历史教学问题, 1991(4): 48-51, 63.
- [32] 魏嵩山. 伍子胥所筑阖闾城究竟在哪里 [J].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2(2): 94-96, 106.
- [33] 吴奈夫. 春秋吴都研究的若干问题 [J].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2(4): 98-107, 124.
- [34] 林华东. 苏州吴国都城探研 [J]. 南方文物, 1992(2): 71-75, 91.
- [35] 张照根. 苏州春秋大型城址的调查与发掘 [J]. 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2, 19(4): 93-96.

- [36] 朱江. 吴县五峰山烽燧墩清理简报 [J]. 考古通讯, 1955 (4): 50-53.
- [37] 王霞, 金怡, 姚晨辰, 周官清. 平四路垃圾中转站抢救性发掘简报 [M]// 苏州博物馆. 苏州文物考古新发现——苏州考古发掘报告专辑 (2001—2006).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07.
- [38] 陆雪梅, 钱公麟. 春秋时代吴大城位置再考——灵岩古城与苏州城 [J]. 东南文化, 2006 (5): 15-24.
- [39] 无锡文库: 第一册 [M]. 南京: 凤凰传媒出版集团, 2012.
- [40] 无锡县志编纂委员会. 无锡县志 [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891.
- [41] 无锡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无锡市志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612.
- [42] 宗菊如, 周解清. 无锡通史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44.
- [43] 蒋赞初. 南京地名考略 [M]// 蒋赞初. 长江中下游历史考古论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 [44] 林杉. 阖闾城揽胜 [M].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13.
- [45] 张敏. 阖闾城遗址的考古调查及其保护设想 [J]. 江汉考古, 2008 (4): 102-108.
- [46] 陆广微. 吴地记 [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
- [47] 金性尧. 明诗三百首 [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279.
- [48] 朱长文. 吴郡图经续记 [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 8.
- [49] 吴都“阖闾城”揭开谜团——专家初步认定: 无锡阖闾城遗址为吴王阖闾都城 [N]. 华东旅游报, 2008-09-16 (6).
- [5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 苏州古城联合考古队 (徐良高, 张照根, 唐锦琼, 等, 执笔). 江苏苏州市木渎春秋城址 [J]. 考古, 2011 (7): 19-26, 103-104, 113.
- [51] 吕继东. 苏州阊门北码头古城墙下发现战国时堆积层 [N]. 苏州日报, 2011-06-17 (A6).
- [52] 李婷. 阊门北码头城墙遗址发现战国堆积层 [N]. 姑苏晚报, 2011-06-17 (A2).
- [53]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 苏州地域考古的新探索 [N]. 中国文物报, 2012-11-23 (6-7).
- [54] 苏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苏州史志·总述: 第一册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1.
- [55] 苏州木渎春秋城址似扇形 总面积达 24.79 平方公里 [N]. 光明日报, 2011-01-12 (9).
- [56] 东周吴越历史考古重大突破 苏州发现春秋超大型城址 [N]. 光明日报, 2010-06-13 (2).
- [57] 楚国历史文化辞典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 160.
- [58] 顾颉刚. 苏州史志笔记 [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37.

(责任编辑: 时 新)

The Status Quo of “the Three Co-existing Capital Cities” of “the Wu Kingdom”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Narration of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tatus of the Ancient City of Suzhou: A Discussion of the Controversies over the History of the Ancient City of Suzhou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and a Commemoration on the Two Thousand Five Hundred and Thir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Ancient City of Suzhou

WU Enpei

(Research Center of Wu Culture, Suzhou Vocational University, Suzhou 215104, China)

Abstract: Recorded in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 of past dynasties and confirmed by the modern archaeology, the academic system of the regional historical culture of the Wu district in Jiangnan in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consists of four parts: “the Wu capital city” (i.e. the big Wu city), now known as the ancient city of Suzhou, “the Li Palace” built by in the Wu Kingdom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now known as the ancient city of Mudu, “the Helv City” in Wuxi, which was a military castle defending the capital city of Wu, and “the Nanwu City” in Kunshan. The core elements are about the thesis recorded in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 of past dynasties and confirmed by the modern archaeology, which supports that “the ancient city of Suzhou”, now located in the city center of Suzhou, was constructed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restored in the (下转第36页)

要说是哪一部，就不太好说。

陈：用世界的眼光来看科幻小说，您认为中国科幻小说的“中国特色”在哪里？

王：一个是中国式题材，对中国人而言，最好写中国题材。因为我们对外国的东西不太了解，写外国题材比较外行，容易让人眼花缭乱，就像外国人写中国小说，就会比较生硬。重要的是思想认识方面，我们没有宗教情结，我们的宗教是基于科学的自然情结。杨振宁说过，科学发展的极致是哲学，哲学发展的极致是宗教。有时人类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势必会对宗教产生敬畏感，这是立足于科学上的宗教意识。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那就是万物是平衡的，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元论。正是科学帮助我们认识了世界，反过来我们对科学也有影响，还有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这其实是一种悖论。

陈：您认为中西方科幻小说最大的差距在哪里？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前景怎样？

王：谈这个似乎有点自己关起门来夸自己。我总觉得中国科幻小说已经可以进入第一世界了。相对来说，我们技术类的科幻还不如西方。毕竟西方科幻作家处在那样的生活环境中，更容易得到信息，技术方面我们达不到。再者就是世界性的眼光也欠缺。我们那个时代是完全闭塞的，虽然现在放开了眼界，写国外的东西的时候，仍然很难把一种概念转化为非常流畅、非常丰满的生活流。至于我们思考问题的深度，并不比西方科幻小说差，我们的生活积淀恐怕还要超过西方。技巧上，我还是不太愿意接受过于现代的手法，相对来说，韩松可能比较超前一些，技巧刚刚够用我认为最好。

参考文献：

[1] 王晋康. 蚁生 [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封4.

（责任编辑：石娟）

（上接第28页）WarringStates Period. This thesis is also proved by the fact that “the former capital city of the Wu Kingdom” was named as “Wu County” governed by Kuaiji province in the Qin Dynasty. It accords with the definition of “the capital city of the Wu Kingdom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given to describe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the ancient city of Suzhou in the file “A List of China’s First Batch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ies (24 cities)”, which is attached to “Not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for the approval of the National Capital Construction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Chines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ies” (No.26, State Council File [1982]) issued by the State Council in 1982. In 1986, when Suzhou held the celebration of the 2500 anniversar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ity, there was no objection to the above academic system formed in history from the state, the historical circle or the archaeological circle. After 1989, some scholars in the historical circle questioned this academic system and even gave subversive opinions. For example, “the ancient city of Mudu” built by the Wu Kingdom is “the big Wu city”. Another example is “the Helv City” in Wuxi is “the Wu capital city”.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 the status quo of the three co-existing capital cities of “the Wu Kingdom”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shows the chaos in the research of Jiangnan history, as it discards the historical theories and historical traditions put forward by famous historians such as Wang Guowei and Li Xueqin. Hence, the paper sorts out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bove mentioned situation, points out countermeasures and expectations of the celebration of the 2530 anniversar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ity, and most important of all offers solutions to the chao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u capital” under the Chines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omain.

Key words : Jiangnan history and culture ; ancient city of Suzhou ; Wu capital ; Helv City ; ancient city of Mudu ; controversy